

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 政策及其后果

咸阳西藏民族学院 师建军

20世纪30~50年代，苏联政府通过流放富农和驱逐少数民族等政策将数百万人口强制迁移到国家边远地区，人为制造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特殊移民。整个30年代，特殊移民政策以“流放富农”为主。30年代中期以后，当局加强了对部分少数民族的强制迁移，特殊移民政策的民族驱逐特征逐渐增强。从40年代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控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特殊移民政策的重心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和一些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针对特殊移民的监管体制不断强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国家新领导人开始着手解决特殊移民问题。时至1965年，特殊移民群体基本不复存在。特殊移民政策的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对国家政治、经济、人口、族际关系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是导致苏联最终瓦解的诸多因素之一。

80年代中期以前，与特殊移民相关的问题一直是俄国学术研究的禁区。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和大量官方档案馆对外公开，俄国学界在特殊移

民研究领域才有了巨大的发展。^①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学者在相关文章和专著中都涉及了苏联特殊移民问题^②，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人对这一课题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在文章中对苏联特殊移民现象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即使在苏联特殊移民的概念上仍存在一定的误区，如认为特殊移民只是指流放富农。事实上苏联特殊移民的范围还应包括斯大林执政时期被当局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和其他一些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现象涉及苏联农民和民族两大问题，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苏联当局在特殊移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违法乱纪、不尊重人权、违反人类社会一般道德原则等行为，充分暴露了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弊端，是导致苏联最终解体和国家分崩离析的重大原因之一。即使是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至今仍为这一政策的恶果——国家农业的落后和民族间的纷争而大伤脑筋。通过研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不仅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而且对判断俄罗斯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本文运用近年来俄国解密以及国内外学者论著中所提供的苏联—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相关文献^③，对苏联特殊移民的基本概念、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后果作一初步的探讨。

① 从事这方面专题研究的俄国学者主要有 В. Н. 兹姆斯科夫、Н. Ф. 布卡依，前者主要从事特殊移民史研究，后者主要从事民族驱逐史研究。

② 中国学者目前还没有直接涉及苏联特殊移民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只有一本关于俄国时期移民的著作（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该著作以1861年至1917年以前沙俄时期的西伯利亚移民为主，对苏联特殊移民问题只是稍有提及。涉及苏联时期移民问题的论文有谭继军的《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和冯佩成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移民现象》（《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本文参考和引用的资料包括俄文著作：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М.: НАУКА, 2005; Буз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огласно Вашему указанию...", М.: АНРО-XX, 1995; Вербицкая О. 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 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2, 以及俄国学者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文资料有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徐天新、叶书宗、郑异凡、杨存堂等《中国史家论苏联》，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等。

一 关于特殊移民的基本概念

特殊移民是在苏联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个非自愿性移民群体

移民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移民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大体上可分为自愿性移民和非自愿性移民两大类。自愿移民是指人口主动地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个地区。例如15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内西欧大量人口自愿迁往美洲新大陆;19世纪美国西部开发阶段东部人口大规模向国家西部迁移;20年代初在政府的鼓励下俄国大量人口自愿迁往东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南部草原地区和森林草原地区等地区。苏维埃国家政权建立之后,为了开发和发展各边疆地区和落后民族地区,政府在组织有计划的移民活动的同时,也鼓励各民族居民自由迁移,据苏联学者估计60~80年代中期国家内部共有1500万人自由迁移。^①非自愿性移民是指由于人口受到外力的强制作用而发生的一种移民运动。根据所受到的外部强制力(地震、瘟疫、战争、私人强制和国家强制等)的不同,非自愿性移民也可分为多种类型。例如,17~19世纪非洲黑人奴隶被大量“强迫迁移”到南、北美洲;苏联30~50年代由于战争等原因而出现的“撤退(эвакуация)人口”、“撤退回迁(резэвакуация)人口”、“遣送回国(репатриация)人口”和“驱逐出境(депортация)人口”等各类型的非自愿移民。

苏联特殊移民^②与上述移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特殊移民属于移民活动中的非自愿性类型,但与其他非自愿性移民又有一定区别。它是在苏联国家专政机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相对其他非自愿性移民群体,苏联特殊移民具有如下特点:①规模大。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1953年被当局以特殊移民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1946~60年代初)》第6卷,盛曾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第485页。

② 苏联在表述这一概念时,使用过三个俄文词,即 трудпоселенец, 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 спецпоселенец,三者为同义词。

方式发送到苏联东、北部边远地区的人口共计600万左右。^①②持续时间长。此类移民活动实际持续时间达20余年——从30年代持续至斯大林去世,直到1965年苏联特殊移民群体才基本不复存在。^③苏联特殊移民的历史总体呈现出以“流放富农”为主逐渐向驱逐少数民族方向演变的发展轨迹。30年代初,在全盘集体化运动和大规模镇压富农的高潮中便有一些苏联少数民族(如德意志族等)作为富农遭到了强制迁移;30年代中期以后“流放富农”力度趋缓,当局开始强化对国家西北、西部、南部和东部诸边境地区一系列少数民族的驱逐政策;40~50年代初,当局在大量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同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驱逐少数民族的活动,少数民族—特殊移民数量逐渐在苏联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中占据主导。^④涉及面广。特殊移民几乎涵盖了苏联时期以农民为主的各个社会阶层;包括了俄罗斯族人在内的大多数苏联民族;既涉及农民问题,又涉及民族问题;对苏联乃至当今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诸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角度上说,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和随后的民族纷争(如车臣战争的爆发)均与苏联政府当年的特殊移民活动不无关系。^⑤

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产生的“特殊人口”群体之一

20世纪30~50年代初,在斯大林的强力镇压政策的指导下苏联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强制移民活动制造了一个规模庞大而稳定的“特殊人口”^⑥群体。特殊人口由多个不同的丧失了自由的子群体组成。它具体包括: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和集中营中的囚犯,流放犯(包括刑事流放犯和政治流放犯),拘留民,检查—过滤营(ПФЛ)犯人,劳动军中的动员民,特殊移民和行政移民,等等。

一般而言,囚犯(заклученные)、刑事流放犯和政治流放犯都是被法庭判决有罪的人,均有一定的服刑期。囚犯是指由于违反国家法律或政治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М.: НАУКА, 2005, с. 283.

②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2页;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4~388页。

③ “特殊人口”一词最先见诸于古拉格相关文件。据最低估计,1929~1953年苏联国内此类人口共计3200万人,其中被送进劳改营、教养院、监狱和苦役营的人数至少有1800万人。参见 Сулов А. 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 - х - начала 50 - 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3, с. 134.

原因被法庭判处监禁而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等固定设施内服刑的没有行动自由的人口。刑事流放犯指由于触犯国家法律而被法庭判决流放的人口。政治流放犯指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法庭判决流放的人口。但在斯大林时期,当局在处理流放案件时往往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指令或决议来执行的。例如1937年当局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6月15日指令,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索契、塔甘罗格、罗斯托夫—顿河地区的如下人口实施了政治流放:1934年12月1日被开除俄共(布)党籍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派、其他“反苏维埃”组织成员及其家属;1934年12月1日被开除俄共(布)党籍,从事反苏活动和反动宣传等分子及其家属;因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遭到政府镇压并被判处5年以上徒刑者及其家属等。^①1942年,当局根据国防委员会1942年5月29日第1828cc号决议又对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的1万名“社会有害分子”实施了政治流放。直到1952年底,这些政治流放民才被转为特殊移民。^②

拘留民:指因存在通敌嫌疑而被关押在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所属集中营中的苏联公民。这些人在经当局审查后,如果查无实据便会被发往特殊移民区。^③例如1950年春季出现的一个特殊移民新类型“来自波兰的拘留民”便属于此类人口。这些人因被当局怀疑与红军为敌而在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的集中营内被关押了6年。1951年3月6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684-343cc号决议他们均被发往位于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

检查—过滤营(проверочно-фильтрационных лагерей)犯人:主要都是些被当局怀疑曾在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中服过役的、从国外被遣返回来的和有叛国嫌疑的人口。经检查—过滤营审查后,这些人口可能获释或直接被转为特殊移民。例如1946年出现的一支规模较大的特殊移民类型“符拉索夫分子”中的多数人就是在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检查—过滤营的审查后才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

劳动军中的动员民:劳动军又称劳动营,是古拉格文件中的一个专用

词汇,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个机构,管理体制类似集中营。被迁入该机构的人口被称为动员民,主要包括特殊移民中的年轻力壮者和军队遣返人员。整个战争期间被动员进入此类劳动营或劳动军的各类人口共计4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苏联德意志族人。对于那些适龄入伍的德意志族男性来说,进入劳动军就算服军役和上前线。1945~1946年,劳动军被当局撤销,应国家动员而进入劳动军的一部分德意志族动员民被当局就地转为特殊移民,另一部分人则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相关决议被迁入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

行政移民(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высланный或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ссылка):行政移民早在沙皇时期便已存在。18世纪20~30年代,沙皇政府根据相关指令将没有人认领的逃奴和流浪汉、被缉拿归案的企图偷渡到国外的人、制造金银物品成色不足者、伪造和倒买金银物品者、酗酒或赌博的工场主和工匠等从原居住地迁往另一地区。斯大林时期,行政移民均拥有“完整的”苏联公民权。他们没有被列入正式的特殊移民登记册,但可能随时被转为特殊移民。当局对于此类移民的管理相对宽松,后者甚至可以自由地出入移民区范围,只是不得返回原迁出地。例如1937年被当局从远东地区强制迁移到中亚地区的朝鲜族人,1938~1939年被从阿塞拜疆迁移到哈萨克斯坦的伊朗人,1942年3月根据列宁格勒前线军事委员会相关决议被从列宁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迁移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区的因盖尔曼兰人(ингерманландцы),等等。^①

在苏联社会中特殊移民的社会地位处于普通公民(如农民或行政移民)和“特殊人口”中其他成员——关押在监狱、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囚犯(包括政治犯、刑事犯)、战俘、被拘留者、检查—过滤营犯人等之间,与由于政治和刑事原因遭到流放的流刑犯也有所区别。与普通公民相比,特殊移民的人身自由和社会权利受到更多的限制,并受到当局的政治歧视(如特殊移民初期政府规定:特殊移民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军,在企业工作的不能参加工会;特殊移民受到移民区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督,不得随意离开移民区范围,否则便会遭到罚款、拘留、逮捕、关进监狱或集中营;一些被驱逐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即使在获得解放之后仍无权返回原迁出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97.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80.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83.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83.

地)。在经济上,特殊移民比一般农民承受的压力更重(例如当局相关法令规定:凡特殊移民工资的5%应扣除,用于支付移民区的管理费用)。在生活方面,特殊移民区多分布在国家边远地区,气候等自然条件极其恶劣。

与“特殊人口”中其他成员相比,特殊移民的社会地位又相对较高。在政治方面,特殊移民至少在特殊移民区内的行动自由是不受限制的,1936年苏联新宪法颁布后特殊移民的选举权得到了政府表面上的承认。在经济方面,特殊移民一般均能得到国家信贷和物资方面的扶持,1944年当局撤销了扣除特殊移民工资5%的规定。当其他类型特殊人口在监狱或集中营服刑期满后,作为一种“优惠”政策当局往往会将其转为特殊移民。在生活方面,特殊移民可与家人一起居住,只要不离开移民区,其生活方式基本上与强制迁移前无太大差异。

特殊移民和流放民都属于强制迁移的特殊人口。不过,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流放民(ссылнопоселенец/ссылные/высланные)属于由于一定的政治和刑事原因被判刑而在监外服刑的犯人。特殊移民一般都是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遭流放的,主要由被当局以富农名义镇压的农民和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强制迁移的苏联诸少数民族组成。流放民都有一定刑期,期满后可获释或被转为特殊移民,而特殊移民则包括有期、不定期和无期等三种类型。当局针对流放民所实行的监管制度比特殊移民更为严厉。^①

特殊移民在发展中的不同类型

整个20世纪30年代苏联特殊移民只有一种类型,即流放富农—特殊移民。40年代以后,当局不断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强制迁移,特殊移民类型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根据不同的标准,特殊移民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

第一,如果从迁移的对象来看,截至1954年1月1日特殊移民整体上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②

^①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67.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29. 附表44《截至1954年1月1日苏联特殊移民人口状况》。

30年代的流放富农——1930~1933年的流放富农、由于在国家粮食采购和其他运动中从事破坏和消极怠工而被法庭判决迁移的人口、因公民证制度和拒绝迁往距莫斯科、列宁格勒等中心城市101公里以外地区而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三项”决议遭到强制迁移的城市无业游民(主要发生在1933年)、根据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决议从边境地区被迁居的人口(主要包括:1936年的波兰族移民,1937年来自苏联—伊朗和苏联—阿富汗边境等地区的移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法庭判刑(主要发生在1932~1933年)3~5年并在囚禁地区服刑期满后又被发送到特殊移民区的犯人。

40~50年代初被驱逐的多个少数民族,这里包括:德意志族移民(普通移民、遣返民、当地民、动员民等),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移民(车臣族、印古什族、卡拉恰耶夫族、巴尔卡尔族),来自克里木的移民(鞑靼族、希腊族、保加利亚族、亚美尼亚族等),1944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土耳其族、库尔德族、赫姆申族等),卡尔梅克族移民,伊朗族移民,卡巴尔达族移民,战前和战后来自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诸州的移民、来自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诸地区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1950年来自普斯科夫州的移民,1951~1952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

其他社会组织和集团包括: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希腊族、“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族等)、“奥乌诺夫分子”,“符拉索夫分子”,耶和華教派(现耶和華显灵派)、“安捷尔斯分子”,“福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的帮凶”,“巴斯马奇分子”,“正宗东正教徒”,战后被迁移的富农(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斯克州的富农、1949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51年来自西乌克兰的富农、1951年来自立陶宛的富农、1952年来自西白俄罗斯的富农),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迁居的移民,以及1944~1945年来自波兰领土的被拘留者。

第二,从移民期限上,苏联特殊移民又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别。

永久性移民——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格鲁吉亚等地的移民,卡尔梅克族移民,德意志族移民,“奥乌诺夫分子”,战后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

移民(1945~1948年来自立陶宛的移民除外),来自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耶和華教派,“巴斯马奇分子”和“安捷尔斯分子”。

未注明期限的移民——属于“遣返民”、“当地民”和“动员民”诸类型的德意志族移民,1945~1948年来自立陶宛的移民,1936年被强制迁居的波兰人,1937年从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地区被强制迁移的移民,正宗东正教派,1929~1933年被迁移的流放富农,“福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部分来自克里木的“其他”类移民,1945年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遣返民。

有期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符拉索夫分子”和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

第三,从特殊移民的人口来源和历史演变总体进程等综合因素上,特殊移民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

在同一时期,针对不同类型的特殊移民当局所实施的管理体制是不同的。例如40年代初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管理已变得较为宽松。大量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解除迁移限制,但波兰族阿萨特尼克^①即使在移民区内也不得自由改变住址。当局为少数民族—特殊移民所制定的管理制度更加严厉。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所生的子女从出生之日起便是自由人,即使那些随父母一起迁入移民区的流放富农子女,如果年满16周岁要到外地求学便会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从出生之日起便被登记为特殊移民身份。

对于同一类型特殊移民,在不同时期当局的管理体制也会发生变化。30年代初,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管理相当严格。例如1931年10

^① 1940~1941年,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波兰族人。阿萨特尼克(осадник)主要是波兰军队退役人员。他们由于在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表现英勇,作为奖励于1920~1930年在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聚居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土地。阿萨特尼克对当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肩负着警察职能。1939年以后随着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地区被并入苏联,阿萨特尼克及其家属被苏联政府宣布为“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强制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流域、乌拉尔、苏联欧洲北部等特殊移民区。

月7日一份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Г.Г.雅戈达签署的《关于特殊移民义务和特殊移民区内行政机构职能的临时条例》的文件便规定:“凡特殊移民不得离开移民区,不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出机关允许,无权变更居住地点和居所;取消其个人和家属生活不得侵犯权、私人住宅不得侵犯权、通信保密权、国家事务的参与权(特殊移民不能参加选举)和自由集会权;特殊移民必须接受强制劳动,其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出机关负责;在企业工作的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5%将被扣除。”^①而到了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的决议则规定:“擅自离开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如果在离开政府指定移民区的最近三年内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政府将不再追究其从移民区逃跑的责任和强迫其返回特殊移民区。”^②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苏联特殊移民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现象,要想为它作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作出如下基本定义: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在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个非自愿性移民群体;特殊移民属于特殊人口之一,社会地位较一般苏联公民(如农民)低下,但又较其他特殊人口优越;受到政府严格监督,必须定期到当地移民区警备管理机关登记,只能居住在政府事先指定区域,不经管理部门同意不得随意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罚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关进监狱或罚作苦役;特殊移民包含有多种类型,但基本上可分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两大类型。

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

列宁逝世后不久,联共(布)党内便爆发了列宁所担心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斗。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击败各个反对派,确立自己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斯大林模式开始在各方面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殊移民政策也随即出笼。

^① Сулов А. 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3, с. 127.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13.

自30年代起,当局开始将特殊移民政策付诸实践。该政策具体包括人口的迁移、运输、移民区管理、劳动生活安置以及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等多项内容,总体可划分为以下两个发展阶段:第一,整个1930年代,特殊移民以“流放富农”为主(包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部分“可疑分子”和城市中的无业游民等)。人口数量约250万人,其中流放富农220万人,其他30万左右。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俄国“富农”人口资源的枯竭,特殊移民政策的民族驱逐特征逐渐增强。第二,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特殊移民政策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开始将移民重点转向诸少数民族和许多带有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殊移民监管制度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持续缩减,截至1953年仅剩两万多人。随着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数量的下降,以民族特征为标志的特殊移民人数渐居主导地位。特殊移民人口总计约350万。

30年代的特殊移民政策——流放富农和迁移部分少数民族

1934年以前被当局以“富农”名义流放的农民,称作特殊移民,1934~1944年间——改称劳动移民^①,1944年3月以后——又继续称作特殊移民。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绝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②1930年1月21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进一步表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并不是限制政策的继续,而是党对富农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

^① 劳动移民,俄文称作 трудпоселенец。它与特殊移民 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 或 спецпоселенец 属于同义词,指在没有任何犯罪行为 and 未经法庭判刑情形下便被当局以各种借口强制迁移的人口。区别在于:前者仅指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而后者所包括的特殊移民人口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指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还包括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4。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50页。

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①

根据斯大林关于富农阶级政策的讲话精神,1930年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新委员会,具体制定了对待富农的新政策。1月26日,政治局批准了该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法律上明确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1930年2月4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电告各地苏维埃政府。^②由此,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

各基层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将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纯行政措施来对待,即先消灭富农,然后实现全盘集体化。遭到当局迁移的富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类别:其一,反革命积极分子——积极反对集体农庄组织,擅自逃离常驻地和以非法身份存在的富农分子;其二,各地方对反苏维埃富农积极分子提供支持,并对之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大富农;其三,落后的富农。在各地方政府对富农实施迁移的活动中,被剥夺财产的并非只有富农,实际上还包括了一些所谓“依附于富农的人”,即中农、贫农,甚至还有一些伙同富农,公开从事反集体农庄活动的雇农。

第一类富农家庭的家长均遭到当局的逮捕,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员、俄共(布)州委(边疆区委)和检察院组成的特别机构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针对第三类富农的迁移,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负责。一般情况下,只在各州或边疆境内执行,不必发往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第二类富农,以及第一类富农的家属均被迁往国家在边远地区为其划定的特殊移民区或劳动移民区(此类移民区又称作“富农流放”区或“劳动流放”区)。具体由当地村苏维埃提出名单,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编制名册和实施没收富农财产的行动。为了帮助各地贯彻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联共(布)中央决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0页。

^②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95页。

定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城市，动员 2500 名党务工作者下乡。

在 1930、1931 年的两年里，共有 60 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24 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农流放”区。到 1931 年底，全国的富农户大约只剩下 15 万户。到 1932 年底，只在民族区和粮食消费区大约还有 6 万户富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了。

当移民到达指定特殊移民区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些富农移民进行挑选：一部分人予以释放，其他一些送往集中营，绝大多数则留在特殊移民区内。例如 1933 年 5 月 20 日 М. Д. 贝尔曼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 Я. С. 阿格拉诺夫和 Г. Е. 普罗科费耶夫报告说：“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通报和你们的批示，我们已对今年 5 月 20 日从高加索来到托姆斯克的 9868 名富农移民实施了检查，其中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三人领导小组的决议，被彻底解放的移民有 85 人，有条件获释 2422 人，送入集中营 64 人，发往特殊移民区 7297 人。”^①

1934 年初，流放富农基本在各移民区安定下来，俄罗斯联邦境内各移民区的特殊移民数量占到了其总量的 97.9%。^② 1935 年以后，当局将富农分子强制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流放富农的规模明显减小。

1931 年 7 月以前，特殊移民的迁移、劳动安置等问题均由边疆区和州执委负责。1931 年 7 月 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特殊移民安置》的决议，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承担特殊移民的行政管理、生活和劳动安置等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要求古拉格^③来具体负责特殊移民区的组建工作。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 1931 年 8 月 16 日第 174c 号、1933 年 4 月 20 日第 775/146c 号和 1933 年 8 月 21 日第 1796/393c 号诸决议，古拉格肩负了对富农迁移的行政监督、生活和劳动安置等各项职能。

为了对 1741 个特殊移民区实施行政管理，截至 1938 年 6 月古拉格共设置了 150 个区级和村级警备派出机构。1937 年，特殊移民区管理和警备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30.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35.

③ 即集中营管理总局，1934 年以前它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辖制，1934 年以后从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机关共有工作人员 25000 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特殊移民部和地方囚禁部负责这些警备派出机构的领导工作。各级管理机构行政费用的 5% (1931 年 8 月前为 25%，1932 年 2 月前为 15%) 由在经济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移民的工资来支付。例如 1937 年劳动移民行政管理机关的实际支出费用为 1700 万卢布，而同期当局从劳动移民工资中所扣除的 5% 提留则高达 2740 万卢布。^①

1930 年代初，被当局用来监督特殊移民的人员都是些解除监禁，尚未服满刑期的刑事犯。一些移民区经常发生警备人员等无故污辱和戏弄特殊移民的恶性事件。鉴于特殊移民经常受到这些人的殴打和欺压，1932 年 4 月 8 日古拉格颁布了一道通令，要求在 1932 年 5 月 15 日以前解除全部囚犯所担当的警备职责。一些对特殊移民实施暴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当局的行政和刑事追究。例如 1931 年末乌拉尔切尔德斯克和楚索夫斯克等区的三个村级警备人员因蓄意谋杀特殊移民而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决议被处以 10 年集中营监禁的最高惩罚。^②

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当局将数百个特殊移民区建立在根本不适于人类正常生活和活动的地方。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在一份文件中便指出：“移民区的设立应经过仔细地考查和研究，最好能建在那些荒无人烟和遥远的北部地区为宜……应遵循以下原则——既要考虑经济方面（便于当地农业和工业部门利用移民的劳动力），同时也要兼顾政治因素，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沼泽、河流和交通困难等）保证移民无法逃走。”^③

1930 年代初，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逃跑、消极怠工、武力抗拒、组织游击队和发动起义^④等反抗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1935 ~ 1936 年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30.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31.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34.

④ 苏联特殊移民体制存在时期特殊移民所发动的最大规模起义于 1931 年 7 月末在纳雷姆斯克边疆区的巴尔比克斯克警备辖区爆发，参加此次起义的特殊移民共计 1500 人。起义遭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警察和党—共青团积极分子武装的残酷镇压。镇压过程中起义者共损失 105 人。起义的组织者被当局判刑，一部分起义的积极参与者（包括其家庭成员在内，共有数百人）被发往遥远的阿列克桑德罗—瓦霍夫斯克惩戒警备区。具体参见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3, 1994, с. 128 - 138.

间,因此而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 6530 人,1937~1938 年 41215 人,1939~1940 年 5467 人。^① 作为惩罚,一些特殊移民被从条件相对较好的“富农流放”区迁往环境恶劣地区。例如 1935 年秋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书记埃依赫的提议便有 94 户特殊移民(共计 460 人)因在完成国家采购计划过程中存在消极怠工等行为被从卡雷万斯克警备辖区迁往边远的边疆区北部。^②

移民初期,“流放富农”的生活相当艰难,物资供应极其困难。其原因有二:第一,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即使这些移民死掉了,仍会有此类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③ 第二,各地区均存在挪用国家划拨给特殊移民粮食的情形。只是到了 1930 年代中期,在预感到未来已不会再有大量新移民来到的情况下当局才开始关心特殊移民的生活状况。相关部门也责成苏联物资供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林业部门自 1933 年 1 月 1 日起在特殊移民中实行了凭证物资供给制度。^④ 1935 年,各移民区特殊移民的生活已逐渐稳定下来。在西西伯利亚北部特殊移民共有住房 16819 所和带有防寒设施的简易宿舍 295 所,但当地还有 12% 的特殊移民依然居住在土窑或半土窑式的居所内。^⑤

“富农流放”之初,移民区中学教育体制极不健全。1931 年,乌拉尔、东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等地的特殊移民区内有学龄儿童 12.9 万人,而上学儿童的比重还不到 3%。^⑥ 直到 1930 年代中期,这种不良状况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多数移民儿童已能够在学校接受正常教育。截至 1938 年 9 月,特殊移民区共建有 1106 所初级中学、370 所不完全中学和 136 所高级中学,另外还有 230 所职业中学和 12 所技校,在校教师 8280 人,其中 1104 人为劳动移民。在校劳动移民子女 217454 人,学龄前教育机构网络中共有特殊移民幼龄子女 22029 人(教师 2749 人)。分布在各移民区内的儿童院共收养移民孤儿 5472 人。移民区内共设有俱乐部 813 所,1202 所图书阅

览室和读书室,440 个移动电影放映队,1149 所图书馆。^①

1936 年春,当局放松了对“流放富农”子女到高等院校和技校学习的限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6 年 4 月 15 日通令和古拉格同年 4 月 20 日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凡特殊移民青年,考入高等院校和中专并得到所报考院校录取通知书者,可从移民区获释;对于那些需要到外地接受入学考试的特殊移民子女,管理部门可批准其离开移民区,并为其开具临时离开移民区的证明信。这一规定也适用于那些考入 8~10 年级中学且需要离开移民区到外地继续求学的移民青年。^②

特殊移民的劳动安置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等领域。其在工业部门的劳动安置主要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与经营机构之间所签订的合同进行。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 5% 将被扣除。^③

1938 年初国家大型工业企业中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一职工。1935 年 9 月以前,当局对特殊移民社会保险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一些企业对在自己单位中工作的移民实行了现行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而另一些企业则没有。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1936 年 7 月 27 日颁布的《关于特殊移民社会保险和劳动条件》决议之相关规定,特殊移民职工的工龄自 1931 年 8 月 1 日起开始计算,此后工作年限才可作为其退休金和津贴发放数量的依据。1931 年以前,特殊移民的一切生活和活动均视作“从事剥削时期”,不计工龄。由于非流放富农出身的劳动移民中有一些人已有多年受雇用的历史,根据 1937 年 8 月 11 日决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又对上述决议作了如下的更正:只有流放富农出身的特殊移民一职工的工龄不计 1931 年 8 月 1 日以前的工作年限。^④

根据相关决议,1934 年以前在农业部门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均可免交国家和地方所有税费。^⑤ 过了这一规定期限以后,所有特殊移民均跟一般农民一样得向国家义务交纳各种赋税。不过由于特殊移民经营状况极其恶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59.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58.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35.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35.

⑤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32.

⑥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44.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44.

②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44.

③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48.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51.

⑤ 针对北哈萨克斯坦从事农业生产的特殊移民,国家的这一优惠政策一直持续到了 1935 年 1 月 1 日前。

劣,政府不得不延长了移民的纳税期限。例如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1933年6月27日决议便指出:“在1936年1月1日以前将免除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特殊移民的所有赋税。”1935年10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也规定:1935~1936年间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特殊移民的农业自留地经营可免除按国家采购计划应缴纳的粮食、土豆和畜产品等义务。^①

1938年初,特殊移民区共建有非章程特殊移民农业合作社1058个。直接在这些合作社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特殊移民人数共计73654人。1938年初,在富农流放区还建立有141个非章程性手工业合作社(人口8181人),均大多分布在西西伯利亚。^②另外特殊移民还被用来从事土地开发和当地畜牧业。

特殊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明显或隐约地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歧视。例如1939年6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事务负责人M. Д. 赫洛莫夫在给内务人民委员П. П. 贝利亚、农业人民委员И. А. 别涅基克托夫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П. П. 洛巴诺夫等所写的一封信中便这样说道:“……苏联人民委员会认为,让特殊移民作为候选人参加农业展览会是不合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方机关也多次向各工业企业和建筑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党委和基层工会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禁止向特殊移民身份的先进生产者发放前往疗养院、休养所和度假胜地的免费证券。如果一定要奖励他们,完全可采用其他方式,以避免其在休假期间从政府划定的移民区逃跑。^③

30年代,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无权服兵役。1932年4月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西西伯利亚和北哈萨克斯坦特殊移民经济安置和劳动利用》和《关于将特殊移民区内后方民兵用于国防—战略意义工作》等决议均强调:“不得将特殊移民适龄人口征召入伍。”^④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禁特殊移民私自掌握军事知识和兵器使用技能。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极力通过各种渠道防止特殊移民自发的军事化倾向,禁止向移民青年发放“伏罗希洛夫步兵”和“时刻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

徽章。根据古拉格1932年12月4日通令,甚至连特殊移民子女组织少先队也被禁止。^①

迁移初期,所有特殊移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从1933年起,特殊移民子女开始恢复此项权利。1933年3月17日,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颁布的《关于恢复富农子女选举权》的决议指出,“流放富农子女成年后,如能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区执委会可恢复其选举权”。^②但成年特殊移民要获得这一权利,至少得经过5年的移民期,另外有关部门还得对其工作和品行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鉴定。1936年12月5日,苏联颁布了新宪法,根据其第135条款之相关规定特殊移民已被认为是拥有完整公民权的苏联人。他们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活动,但仍无权返回原迁出地。1937年8月,И. И. 普里涅尔在一份写给Н. И. 叶若夫的报告中说:“近3~4个月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收到了大量特殊移民发来的申诉书。后者纷纷抱怨说,虽然国家通过了新宪法,但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并未发生任何改变。”^③

还在30年代初的流放富农期间,便有一些少数民族被作为“流放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例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和波兰人便被作为富农遭到了流放。^④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当局开始在国家各边境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民族驱逐活动。先后遭到强制迁移的民族有:苏联西北部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自治共和国的芬兰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波兰人,南部外高加索地区的库尔德人和伊朗人以及远东地区的朝鲜人,等等。上述事实表明,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重心已呈现出从流放富农转向民族驱逐的迹象。

1940~1953年的特殊移民政策

这一新政策显示出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控制、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和强化针对特殊移民的管理制度。

从30年代初“富农流放”之日起,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47-48.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51.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57.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61.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61-62.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62.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64-65.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81.

殊移民便由于各种原因(如死亡、“不公正迁移”、子女求学、根据1938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而转交抚养、转交有关组织照管等)不断“损失”。期间,只是由于不断有新移民的加入,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总量才一直维持在90万人左右。^①

1941~1954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变化的基本趋势

年/月/日	人 数	年/月/日	人 数
1941年10月1日	936547	1948年4月1日	210556
1942年1月1日	911716	1949年1月1日	130463
1943年1月1日	724498	1950年1月1日	108386
1944年1月1日	669687	1952年1月1日	42166
1945年1月1日	631137	1953年1月1日	24686
1946年1月1日	599477	1954年1月1日	17121
1947年4月1日	481186		

资料来源:该表系笔者根据俄国学者兹姆斯科夫的专著和文章中的相关数据编制而成,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98-99, 104, 149, 154, 210;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 (1930-1954гг)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1, с. 131, 132。

根据此表的统计数字,从40年代起,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开始不断萎缩。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战前和战争期间,当局未再延续以前的“流放富农”政策,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来源枯竭。

其二,战争期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大量流失。例如战争初期乌克兰的赫尔松州,卡累利—芬兰诸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奥尔德若尼基则夫斯克边疆区、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诸州等特殊移民区均被敌人占领。据当局194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人占领期间仅赫尔松地区流失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便有5250人。^②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红军解放该地区之前与撤退的法西斯军队一起走的。

其三,战争期间,大量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青壮年人口应征入

伍。这些人在战后均未返回移民区,从而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构成中非生育年龄段(中、老年和16周岁以下儿童)人口比重增加,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数量下降。关于1945~1950年此类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关数据可参见下表。

1945~1950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比值

年 代	出生人数	死亡人数	出生与死亡人数比
1945	6532	8196	-1.25
1946	6269	5980	+1.05
1947	2826	3216	-1.14
1948	1165	1980	-1.70
1949	1097	1450	-1.32
1950	357	734	-2.06
1945~1950	18646	21556	-1.16

资料来源: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42 (附表13)。

从上表可明显看出,除1946年外,1945~1949年间的其他年份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口出生数量均低于死亡数量。最终统计结果也表明,此类特殊移民的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

其四,战后,许多在集体化期间被流放的德意志族、车臣—印古什族等特殊移民均被根据其民族属性迁入战争期间各被驱逐少数民族所在的特殊移民区,与自己的同族人合并到了一起。例如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52年7月1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还有28009人,但其中并没有包括1929~1933年及稍后年代以流放富农名义被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德意志族(13898人)、卡尔梅克族(87人)、格鲁吉亚族(1716人)、来自北高加索的少数民族(450人)和来自克里木的少数民族(16人)。^①他们被当局依照民族特征归入另一类特殊移民: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卡尔梅克族特殊移民等。

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局对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24-125 (附表4)。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14。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 (1930-1954гг), с. 136。

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所实施的大范围解放政策。

第一，解除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服役者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

1942年4月1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颁布了第1575cc号决议。根据该决议，1942年4月15日至5月15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适龄入伍青年35000人”被征入红军。自1942年4月15日起，他们将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补充到作战部队和从前线撤出的步兵师中，另外也可直接用于组建坦克部队和其他特种兵部队”。自战争爆发至1942年11月，应征入伍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60747人。^① 1942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撤销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002303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在一个月之内“注销所有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直系亲属（妻子和子女）的特殊移民身份”，“无条件地向其发放公民证和免除其5%的工资提留”。^② 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以后，此类红军士兵的战斗士气明显高涨起来。1943年，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的此类人口及其家属共计102520人。^③

第二，当局认为，在经过数年改造之后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已成为“能够积极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守法公民”，因而出台了一系列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决议和法令。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所颁布的决议规定，“过去擅自离开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如果近年来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则不必返回特殊移民区。政府也不再追究其逃跑的责任”。^④ 另外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5月25日指令，“凡到职业技校和工艺学校学习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均应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⑤ 1946年9月28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了《关于从特殊移民区释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条例》的第00868/208cc号法令。其中规定：“从特殊移民区释放的流放富农具体包括：1) 有子女在红军中服役或卫国战争参加者的家属；2) 家庭成员得到了政府

的表彰和奖励；3) 与非特殊移民结婚的女性移民。此类案件的办理只需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与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检察院经协议后所作出的结论，不必再呈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特别会议批准。”^①

第三，政府以前所公布的解放特殊移民相关法令仍继续发挥作用。从1941年1月1日到1943年4月1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决议^②，共有136240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其中1941年62808人，1942年63113人，1943年1~3月10319人，1944~1953年，仅凯梅洛夫斯克州6万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便有49513人根据该法令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③

第四，在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过程中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政府机关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俄共（布）新西伯利亚州委书记M. 古拉金1947年3月20日给俄共（布）中央书记A. A. 库兹涅佐夫的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沃洛郭特州向中央提交的类似申诉和1949年11月阿穆尔州执委向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递交的关于彻底解放本州境内流放富农的文件等，均提出了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问题。他们的理由归结如下：大多数流放富农已近中、老年，已适应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他们在战争期间表现积极，未从事任何反苏活动，不再对社会构成危害。根据以上申诉，苏联部长会议出台了1947年5月7日第1413-375cc号决议，其主要内容包括：解放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沃洛郭特、莫洛托夫和新西伯利亚诸州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从1946年8月到1952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依据各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提议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决议。根据这些决议，苏联28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境内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不包括其中的德意志、卡尔梅克和车臣等民族）几乎全部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同期，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发出的特别指令被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408391人。^④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95.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 (1930-1954гг), с. 130.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95.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96.

⑤ Земсков В. 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 (1930-1954гг), с. 132.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96.

② 1938年10月22日决议规定，凡“前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在16周岁以前身份随家庭而定，当其年满16周岁以后，其特殊移民身份将被注销，并成为自由的、享有完整权利的苏联公民。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67.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33-134.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37.

根据所颁布的一系列解放法令,1941~1952年被当局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882622人。其中1941年1月1日到1948年1月1日810614人,1948年1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21824人,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1月1日7628人,1950年到1952年42556人。^①

早在1947年末,苏联内务部领导层便有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打算。^②不过苏联内务部提出的关于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建议并未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另外各地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部委的阻挠。例如1947~1951年,俄共(布)凯梅罗夫斯克州委和州执委就解放当地流放富农的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的建议便遭到了苏联煤炭工业部的反对。后者担心此举可能造成自身劳动力的大量流失。^③

稍后,内务部在全面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方面还作过一些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53年4~5月间,苏联内务部拟定了关于解放大部分特殊移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根据该草案,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理应在1953年8月以前全部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不幸的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贝利亚在1953年6月23日被逮捕了,从而使所有既定计划都落了空。1953年8月,苏联内务部领导层曾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请示是否实施解放特殊移民的计划,可一直未得到明确的答复。^④尽管这样,40年代到1953年以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数仍一直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

从40年代初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强制迁移的重点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1940年8月在以武力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纳入苏联版图后,当局又将当地20多万“不可靠的”人流放西伯利亚。1940~1941年,当局将波兰阿萨特尼克的难民(38万)迁入特殊移民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通敌”为由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和麦斯赫特—土

耳其等11个民族数百万人赶出家园。苏联部长会议也通过决议,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克里木自治共和国(1943年12月27日)、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3月7日),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称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1944年初),取消卡拉恰耶夫自治州(1943年10月);宣布卡拉恰耶夫(人口约10万)、卡尔梅克(人口约12万)、车臣(人口约60万)、印古什(人口约13万)、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人口约8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民中绝大部分成为特殊移民。^①

除上述被整体迁移的少数民族外,当局还在40~50年代初对一些社会组织和集团实施了强制迁移。这些被迁移的人口大都带有少数民族特征,而且在特殊移民数量方面均比上述遭到整体迁移的苏联少数民族要少,因此基本可归入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类型。主要有如下类型人口。

(1) 战争期间与德意志族人、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一起被迁移的“其他”类人口。

战争期间,当局在对德意志族、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实施强制迁移的过程中均包含有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口。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局局长B. П. 特罗菲莫夫起草的《关于与来自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等地区少数民族和德意志族人一起遭到驱逐,目前仍居住在特殊移民区内的其他类移民数量的报告》显示:1941~1942年被迁移的苏联德意志族人中“其他类”移民共有1721人,其中俄罗斯族662人、乌克兰族355人、波兰族124人、立陶宛族11人、拉脱维亚族104人、芬兰族58人、奥地利族34人、爱沙尼亚族33人等;1944年与克里木鞑靼族一起被驱逐的“其他类”人口共计3628人,其中俄罗斯族1280人、茨冈族1109人、德意志族427人、无国籍土耳其族272人、乌克兰族257人等;同年来自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其他类”人口包括土耳其族676人、阿扎尔族411人、格鲁吉亚族224人等;1943~1944年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类”人口共计1602人,其中库梅克族485人、阿瓦尔族311人、达吉斯坦族235人、塔夫林族186人、阿巴兹族52人、奥塞梯族49人、诺

①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12.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97.

② 内务部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特殊移民》的决议草案。这一草案与相关书面论证报告均一起转交苏联中央行政机关和贸易—财政机关诸部委审议。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97.

③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51.

④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29.

盖族 41 人、俄罗斯族 35 人、达尔金族 34 人等。^① 上述这些其他民族人口便构成了被整体驱逐各少数民族中的“其他”类型特殊移民。

(2) 1942 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

根据 1942 年 5 月 29 日国防委员会第 1828cc 号决议, 当局对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的所有“社会有害分子”实施了迁移。此次迁移包括了很多民族, 人口至少在 1 万人以上, 以希腊族人居多。因此这次移民也可称作针对上述地区希腊族人的驱逐活动。截至 1952 年底以前, 这些移民主要以政治流放民身份存在, 直到 1952 年末才被转为特殊移民。^②

(3) 卡巴尔达族特殊移民。

1944 年, Б. 科布洛夫在从纳尔奇克发给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的电报中称, 根据 1944 年 5 月 25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关于迁移德国法西斯走狗、叛徒、卖国贼、自愿与德国人一同离开者家属》的第 00620/00190 号命令, 有关部门已决定在 6 月 20 日对卡巴尔达族人实施迁移行动, 预计迁移人口为 2492 人。所有这些人的移民地都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江布尔州和南哈萨克斯坦州。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克鲁格洛夫在 6 月已批准了这项移民计划。^③ 6 月 20 日凌晨 4 点, 迁移行动正式开始。共有 165 名精干工作人员和 400 名红军战士参加了这次行动。根据原定计划, 首批应迁移 710 户 (2467 人)。但由于一些红军服役人员家属和 70~90 岁的老人被免迁, 最终首批被迁移人口仅用 53 节车厢, 发送人数 2051 人。^④

(4) “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

苏德战争期间, 许多苏联德意志族人没有从西部地区撤离, 这些人随后便被当局宣布为“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1944 年 8 月 24 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从高加索地区的城市 and 疗养区驱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的第 001036 号命令。该命令具体内容如下: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19.

② Бугай Н. Ф. 40-50-е год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архивы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91, №1, с. 129.

③ Бугай Н. Ф. 40-50-е год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 130.

④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15.

“1) 从高加索温泉地带的城市和疗养区向新西伯利亚州迁移德国人帮凶、祖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家属 378 户 (共计 850 人)。此次行动将于 1944 年 8 月 31 日正式开始, 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特卡琴科同志负责实施。2) 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阿尔卡季耶夫同志向各特殊移民始发站调拨迁移行动所需的闷罐车。3) 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运管理局局长巴奇科夫少将负责派出必要的警卫人员, 以确保移民行动的运输安全。4) 责成苏联内务副人民委员切尔内绍夫向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调拨 3 吨汽油并确保特殊移民旅途中的饮食和医疗服务。5) 责成新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负责将这批移民分送至各指定特殊移民区并为其安置工作。”^① 根据统计资料, 1945 年初实际迁入新西伯利亚州的“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共计 674 户 (1490 人)。^②

(5) “奥乌诺夫分子”。

“奥乌诺夫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成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是 1929~1940 年初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出现的一个法西斯组织, 其前身为乌克兰军事组织。“奥乌诺夫分子”曾积极协助法西斯分子, 反对西乌克兰与苏维埃乌克兰合并。苏德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 “奥乌诺夫分子”联合乌克兰匪帮一叛乱组织并在德国人帮助下不断在乌克兰境内制造紧张局势。仅在 1944~1953 年, 乌克兰西部各州便发生了 14424 件匪帮分子袭击事件, 其中恐怖和破坏事件 5099 起, 解除苏维埃工作队武装 457 起, 焚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1004 起, 等等。在以武力清除当地匪患的同时, 当局决定对“奥乌诺夫分子”实施强制迁移。1944 年 3 月 31 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迁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的命令。该命令要求将被判刑、被俘或在冲突中被击毙的“奥乌诺夫分子”骨干及其家属中的所有成年人在剥夺财产后全部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诸州。贝利亚要求立即执行这些命令。他在相关文件中写道: “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流放奥乌诺夫分子的决议公布之日起, 各地应立即展开驱逐乌克兰民族主义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03.

② Бугай Н. Ф. 40-50-е год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 134.

者联盟分子及其家属的行动,不必再等待特别会议的决定。”^① 1942~1952年,当局共迁移“奥乌诺夫分子”及其家属 171566 人(成年人口 131319 人)。^②

(6) “正宗东正教徒”。

1944 年 6 月初,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了关于迁移“正宗东正教徒”的计划。1944 年 7 月 7 日,贝利亚在向斯大林呈递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了关于“正宗东正教徒”的活动情况:“该教派过着寄生的生活,不纳税,拒绝履行国民应尽义务和职责,不允许子女到学校读书。他们对集体农庄起到了瓦解的作用。”贝利亚建议“将分布在 62 个居民点中的正宗东正教徒及其家属一起迁往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监督”。贝利亚请求斯大林批准,“在 1944 年 7 月 15 日开始实施此次迁移行动”。7 月 14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共同签发了《关于迁移“正宗东正教徒”》的第 2683-1/12938 号命令并于 7 月 19 日下发各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7 月 20 日,迁移行动首先从梁赞州南部地区开始,共有 489 户(1323 人)“正宗东正教徒”被迁。所有这些人的迁居地都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托木斯克州和秋明州。^③

(7) “德国人帮凶”。

1944 年 8 月 24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关于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驱逐“德国人帮凶”》的第 001036 号命令。12 月 12 日,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目前已确定迁移的‘德国人帮凶’共计 735 户(2238 人)。迁移行动将于 1945 年 1 月 25 日在各地同时展开。请您给予指示。”^④ 不久,根据当局的命令所有“德国人帮凶”都被发往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从事植棉工作。

(8) “符拉索夫分子”。

“符拉索夫分子”——A. A. 符拉索夫将军领导的反苏维埃军事组织“俄罗斯解放军”成员。其主要是一些受德国法西斯宣传机构鼓惑,饥寒交

迫,对集体化和 1937 年大镇压不满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族人。“符拉索夫分子”是 1946 年出现的一个人口规模较大的特殊移民类型。当局迁移此类人员的依据是 1945 年 8 月 18 日国防委员会第 9871 号决议,1945 年 12 月 2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 1946 年 3 月 29 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曾在德国军队、军团和警察部队中服役,后经检查一过滤营审查的“符拉索夫分子”迁往特殊移民区》诸决议。上述决议规定:“符拉索夫分子”在特殊移民区的居住期限为 6 年。此类特殊移民区的地理分布如下:哈萨克共和国、布里雅特—蒙古和科米等自治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克麦洛沃和莫洛托夫诸州。“符拉索夫分子”主要包括两部分人:经检查一过滤营审查后的查无实据者和从古拉格劳改营获释的囚犯。根据苏联国家安全部 1951 年 10 月 24 日的统计数据显示,1945~1951 年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符拉索夫分子”共计 177573 人。^① 从 1951 年下半年起,当局开始放松对“符拉索夫分子”的控制,针对这一类特殊移民的解放力度也不断增大。

(9) 根据 1948 年 6 月 2 日法令被迁移的人口。

1948 年迁移“扰乱社会治安犯”的情况

迁出地区	“扰乱社会治安犯” 人 数	其家庭成员 人 数	总 数	后补迁出的 人 数
俄罗斯联邦各州	14845	6669	21514	375
乌克兰共和国	8860	2826	11686	33
白俄罗斯共和国	221	21	242	7
哈萨克共和国	1291	1265	2556	—
乌兹别克共和国	982	77	1029	57
吉尔吉斯共和国	143	41	184	13
塔吉克共和国	121	21	142	—
阿塞拜疆共和国	112	—	112	4
亚美尼亚共和国	251	180	431	3
格鲁吉亚共和国	398	15	413	3
卡累利—芬兰共和国	24	17	41	—
总 计	27248	11132	38350	495

资料来源:参见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огласно Вашему указанию...”, с. 234.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05.

②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37.

③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16.

④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17.

① Суслов А. 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 - х-начала 50 - 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3, с. 134.

1948年,特殊移民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移民人口类型农民——“扰乱社会治安犯”。根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H.C.赫鲁晓夫的建议,1948年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和生活腐化分子迁出乌克兰共和国》的决议。在H.C.赫鲁晓夫的鼓动下斯大林决定将乌克兰的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1948年6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出台了《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和生活腐化分子迁往国家边远地区》的法令。依此法令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都是所谓未完成最低劳动日义务的集体农庄农民,流放期为8年。此类人口的迁移一般先由集体农庄社员大会组成的公共法庭作出“公议性判决”,经区执委会批准后执行。1948年9月16日,苏联内务部警察总局也颁布了《关于军人因1948年6月2日法令而迁移者均没收其军人证》的指令。

根据上表所示,1948年根据该法令被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38350人,其中来自俄罗斯联邦各州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乌克兰共和国。以后数年,此类迁移活动仍在继续,但规模逐渐趋缓(例如,1949年有4756人,1950年有675人,1951年有240人,1952年有260人)。^①

(10) 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区的移民。

战后1945~1949年,当局针对波罗的海沿岸居民的迁移主要根据以下指令:1945年6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指令,1946年12月10日苏联内务部指示,1946年12月18日苏联内务部《关于从立陶宛共和国迁移匪帮头目和积极分子等家属》的法令,1948年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从立陶宛共和国迁移处于非法状态、在武装冲突中被击毙、被判刑之匪帮和民族主义者等家属,匪帮帮凶,富农及其家属》的决议,1949年1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诸共和国迁移富农及其家属、匪帮和民族主义者等家属》的决议。根据上述法令,1945~1949年当局共从波罗的海沿岸迁移人口143600人,其中来自立陶宛81200人,来自拉脱维亚约41900人,来自爱沙尼亚20500人以上。^②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34.

② Бугай Н. Ф. 40-50-е год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 128.

(11) 来自“黑海沿岸”(希腊人、“达什纳克党人”和土耳其人等)的移民。

1949年5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迁移“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和希腊等民族》的第2214-356cc号决议。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诸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黑海沿岸(奥德赛和克里木等地区)。此类移民在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部相关资料中均被称作“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其中希腊族移民主要被迁入哈萨克共和国,“达什纳克党人”(亚美尼亚族人)被送往阿尔泰边疆区,土耳其人被发往托姆斯克州。1949年,从“黑海沿岸”地区迁入各特殊移民区的人口共计57680人,他们均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①

(12) 战后被迁移的富农(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1949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51年来自西乌克兰的富农、1951年来自立陶宛的富农、1952年来自西白俄罗斯的富农)。

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当局开始在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右岸和北布科维纳等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对当地数万名农民进行了剥夺和强制迁移。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第9局的统计资料,这些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均被纳入战后(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达维亚的“民族主义者”特殊移民类型,少部分人在迁入特殊移民区后形成了以下四个独立的特殊移民类型:“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0月6日决议);“来自乌克兰共和国西部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月23日决议);“来自立陶宛共和国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5日决议);“来自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18日决议和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3月25日指令)。^②

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1948年10月6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3785-1538号决议当局开始了针对伊兹梅尔州富农分子的迁移行动。根据托姆斯克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斯梅什利亚耶夫的通报,11月抵达该州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66.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83-184.

的富农分子共计 250 户 (1100 人)。这些人全部被安置在托木斯克州的“德古利杰茨”企业参加劳动。当月底,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报告中写道:“为了对移民实行管理和监督,我们在富农分子居住的各地区都成立了内务部特别管理处。在从伊兹梅尔州迁移这批富农分子的行动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①

1949 年驱逐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49 年 4 月 6 日,根据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共(布)中央局和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从摩尔达维亚迁出富农分子、大地主、德国人帮凶、亲法西斯组织成员及其家属》的第 129-467cc 号决议。苏联内务部在相关总结报告中指出,1949 年从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入西伯利亚各地区的富农分子、地主分子、大商人、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积极帮凶、白卫军分子和反革命党派成员共计 35050 人。其中被安置在集体农庄的此类人口共计 2354 户 (9679 人),在国营农场得到安置的有 1878 户 (7272 人)。据阿尔泰边疆区内务部管理局局长沙霍夫 6 月的通报,当地内务部机关依照苏联内务部 1949 年 6 月 11 日命令对来自摩尔达维亚的 1172 户富农分子进行了劳动安置。另据该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尤金报告,同年 7 月一批来自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移民(共计 1439 人)迁入克麦洛沃州,同年 8 月又有摩尔达维亚族移民 998 人迁入阿穆尔州。移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很多人都居住在不适于人居住的窝棚里。^②

迁移乌克兰的富农:根据 1951 年 1 月 23 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关于从乌克兰西部诸州迁移富农及其家属》的第 189-88cc 号决议、9 月 5 日第 3309-1568cc 号决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 1951 年 12 月 20 日命令,乌克兰境内 1700 名富农分子及其家属被强制迁往托木斯克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1952 年 2 月 11 日,又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共 1057 人被迁往秋明州。负责这批移民安置工作的是苏联内务部长 С. Н. 克鲁格洛夫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③

迁移立陶宛的富农:1951 年 9 月 5 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立陶宛共和国中敌视集体农庄的富农及其家属实施永久性迁移》的决议。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35.

②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38.

③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44.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截至 1952 年 1 月 1 日登记在册的来自立陶宛的特殊移民共计 16833 人,同年 7 月 1 日其数量已增加到 18027 人。^④

迁移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1 年 9 月 18 日第 3538-1645 号决议和 1952 年 3 月 25 日第 6435 号指令,1952 年 4 月 7 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了第 436 号决议,决定将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分子及其家属迁往国家东部地区。1952 年 4 月 23 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长巴斯科夫在给苏联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的通报中说:“从 1952 年 4 月 18 日开始的驱逐富农分子的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原计划迁移 1170 户 (4082 人),实际共迁移 1194 户 (4298 人)。”关于此,伊格纳季耶夫还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我们在 4 月 18 日深夜开始了迁移富农分子的行动,整个行动持续了一昼夜,共迁移移民家庭 1194 户 (4298 人)……为运送这批移民我们共动用了 5 个专列。”^⑤

(13) “巴斯马奇分子”。

“巴斯马奇分子”——苏德战争期间在塔吉克斯坦出现的一个亲法西斯组织,领导人为 Г. О. 巴斯马奇。1950 年 1 月 11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从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移“巴斯马奇分子”》的第 135-26cc 号决议。根据苏联内务部 1950 年 3 月 1 日第 00157 号命令,巴斯马奇分子及其家属共 2795 人于该年 8 月被迁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科克切塔夫州特殊移民区。^⑥

(14) “安捷尔斯分子”。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1 年 2 月 13 日第 377-190cc 号决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 1951 年 3 月 5 日第 00193 号法令,当局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安捷尔斯所领导的波兰军队军人及其家属强制迁往伊尔库茨克州。截至 1952 年 7 月 1 日,“安捷尔斯分子”特殊移民共计 4548 人。^⑦

(15) 耶和华教派(现耶和华显灵派)。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1 年 3 月 3 日第 667-339cc 号决议,当局对居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56.

⑤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48.

⑥ Бугай Н. Ф. 40-50-е год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 133.

⑦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58.

住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耶和华教徒”及其家属实施了强制迁移。根据苏联内务部1951年3月5日第00193号命令,这些“耶和华教徒”均被发往位于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州的特殊移民区。^①

(16) 1944~1945年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

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是1951年春新出现的一个特殊移民类型,人数仅70余人。根据1951年3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684-343cc号决议,当局将1944~1945年在波兰领土上被拘留、被俘和从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获释的苏联公民中的大部分人都发往位于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②官方文件中称此类人为“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

(17) 1951~1952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

1951年11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对格鲁吉亚“反动分子”实施迁移》的第4893-2113cc号决议。被纳入“反动分子”范围的人包括:苏侨直系亲属,叛国者家属,居住在海外并从事反苏活动的叛逃分子家属,1946~1949年从法国、伊朗和中国返回格鲁吉亚的归侨,被当局怀疑与土耳其间谍机构有染的人员,等等。此类特殊移民共计11643人,其中包括亚述里亚等民族。^③

事实上,苏联当局在20世纪30~50年代所实施的强制移民活动还有很多。我们这里只是着重列举了一些与特殊移民有关的人口强制迁移活动。当局在放宽对前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还不断强化针对驱逐民族—特殊移民的监管制度。

第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1945年1月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35号法令要求所有具劳动能力的特殊移民均必须参加社会有益劳动。对于那些违反劳动纪律的特殊移民,有关部门将依照现行国家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凡不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警备管理部门允许,擅自离开特别警备部所划定移民区者,将被视作逃跑。特殊移民的家长或其继承者,在由于生育、死亡、逃跑等原因导致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在3日内向所在移民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警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45.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83.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84.

备部报告。^①

1948年6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841-730c号决议,要求各地方机关严肃追究那些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相关刑事责任。仅在1949年苏联内务部所属特别委员会便因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罪而给予303名特殊移民劳动教养8年的判罚。^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11月26日法令和1949年6月《内务部特别警备部为各地方警备机关在移民—特殊移民中开展工作而制定的行动细则》规定,德意志、卡拉恰耶夫、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克里木鞑靼、克里木希腊、克里木保加利亚和克里木亚美尼亚,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及迁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口(包括1949年遭到迁移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驱逐民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均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凡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永久性移民,如果从指定区域逃跑,将受到20年苦役、剥夺人身自由5年的惩罚。当局要求此类移民填写“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如果擅自逃离指定移民区,将被判20年苦役”的保证书。永久性移民(男性和女性)与非迁移民结婚者,其本人不得解除特殊移民身份。^③

第二,加强针对特殊移民的谍报工作。

当局极其重视在特殊移民中招募间谍和情报员的工作。例如截至1945年3月1日当局在源自克里木特殊移民中所建立的特务—情报网便有519人,其中,特务头目5人、特务12人和502名情报员。同期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克里木—特殊移民中——2730人,相应数据分别为15、82和2633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还将招募神职人员充任特务,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1945年末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穆斯林神职人员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安插了16名特务和23名情报员。与此同时,特殊移民中的“老居民”,即“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当局所培植的规模庞大的特务—情报网络仍在发挥作用,据相关资料,截止到1944年12月1日,该情报网络共计13325人,其中特务头目174人,特务561人,情报员12590。截至1953年1月1日,特务33463人,秘密接头处所468个,

①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21.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87.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61.

十户长 94246 人。^①

第三, 特殊移民区管理监督机构的强化。

截至 1953 年 1 月 1 日当局对特殊移民等实施监督的人员共计 10752 人, 特别警备派出所协助人员 1861 人, 监视人员 2801 人, 别动一辑查分队成员 1217 人。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监督均通过安插在移民中的跟线(特务)和十户长来进行。为了确保特殊移民人口及时注册和各项规定制度的具体实施, 截至 1953 年 4 月 10 日当局共设立了 51 个特殊移民部、19 个特殊移民分部、2916 个特别警备机构和 31 个行动一辑查分队。^②

第四, 针对特殊移民的镇压。

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遭到当局逮捕和判刑。仅 1944 年 9 月至 1945 年 10 月 1 日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移民便有 1.3 万人以上。^③ 1946 年 1 月 1 日至 1947 年 4 月 1 日期间, 各特殊移民部共逮捕特殊移民 7907 人, 其中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活动罪 1612 人, 叛国罪 1104 人, 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罪 285 人, 匪帮 45 人, 怠工罪 45 人, 间谍罪 21 人, 实施恐怖和恐怖企图罪 12 人, 危害社会罪 7 人, 匪帮帮凶和窝藏罪 6 人, 从事破坏活动罪 4 人, 违反军纪 17 人, 渎职罪 20 人, 其他犯罪 4729 人。^④

自 1949 年以后, 鉴于 1948 年 11 月 26 日法令的强大威慑, 特殊移民逃跑人数急剧下降。1949 年从移民区逃跑的人数缩减到了 1948 年的 1/4。1948 年因逃跑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 3746 人, 1949 年 8636 人, 1950 年 2872 人, 1951 年 423 人, 1952 年 345 人。1949~1950 年 6 月间因逃跑而被当局判刑的 2776 名特殊移民都是根据 1948 年 11 月 26 日法令定罪的, 即服苦役 20 年。^⑤

第五, 特殊移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战争期间和战后, 诸类型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继续受到当局的各种歧视性待遇。

其一, 根据相关法令, 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身份世袭, 他们即使在年满 16 周岁之后, 仍以个人身份被登记为特殊移民, 不得获

释。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间劳动移民管理部门从劳动移民中共划分出 12574 个家庭。当局规定: 苏联人民委员会 1938 年 10 月 22 日关于解放劳动移民年满 16 周岁子女的决议不适用上述人口。1944 年, 这一规定还扩展到“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如下一些民族: 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克里木鞑靼等。^①

其二, 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不得参军。如上所述, 战争爆发后, 迫于兵源不足, 当局曾大量动员特殊移民子女应征入伍。但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遭驱逐少数民族均被排除在外。虽然有一些此类人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参了军, 但其绝大多数都被动员进入了类似于“苦役集中营”的所谓劳动军。^②

其三, 虽然国家法律规定, 在工业部门工作的特殊移民在劳动条件和工资等方面均理应与企业其他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会遭到企业的歧视, 不能与自由雇佣工人同工同酬。苏联内务部部长 С. Н. 克鲁格洛夫在一份《关于内务部机关在特殊移民中的工作和任务》的指令中曾指出: “时至今日企业克扣特殊移民工资的现象仍未彻底消除。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林业采伐工施卡坚科与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埃依涅尔干一样的活, 可在结算工资时, 施卡坚科所得工资数量为 7000 卢布, 而埃依涅尔仅得 700 卢布。”^③ 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对特殊移民子女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他们不允许特殊移民子女前往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首府上学, 对其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设置障碍。例如 1951 年托姆斯克州就严禁特殊移民子女前往托姆斯克市就读; 1952 年伊尔库茨克州禁止 269 名特殊移民子女去州首府求学; 1952 年哈萨克共和国限制特殊移民子女到高等院校就读。^④

综上所述, 苏联移民政策呈现出从流放富农逐渐转向民族驱逐的趋势: 20 世纪 30 年代以流放富农为主; 40 年代的重心转向解决民族问题。30 年代, 斯大林发动特殊移民的初衷是为了迅速实现集体化。通过流放富农; 一方面消灭农村中敌视国家集体化政策的成分, 弥补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不足; 另一方面, 也可以利用所没收的富农资产来建立集体农庄。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09.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87.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09–110.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88.

⑤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92.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00.

②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92.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59.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171.

虽然当时苏联国内民族问题同样严重,但并非国家的当务之急,因而期间只有部分民族遭到驱逐。40年代随着集体化的实现和战争的爆发,富农问题退居其次,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看来民族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局借口“维护国家安全”将特殊移民的重心转向民族驱逐。^①在放松对前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国家针对诸驱逐民族的特殊移民政策却愈益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殊移民政策从流放富农向民族驱逐的转折,是30年代已逐渐开始的民族驱逐的逻辑终结。如上文所述:30年代便有一些民族被作为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各边境地区诸少数民族不断遭到迁移,到了40年代初局部民族驱逐演化为民族整体驱逐。特殊移民是一种依靠强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它违背人类道德基本准则,不得人心,因而难以持久。随着苏联政权的更迭,特殊移民政策也走到了尽头。

三 特殊移民问题的解决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解冻”的征候开始在苏联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渐显现,新的国家领导人敏感地意识到继续维持特殊移民体制已不可能。1950~1953年,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向苏共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民情分析资料。这些国家权威性机构的负责人均认为继续在国内推行以往的镇压政策已是“危机重重”。如果说,1937~1938年在企业和机关发布关于镇压“人民公敌”的消息还会赢得群众热烈拥护的话,那么,在1950年代初苏联民众的思想状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关于镇压的消息已不会再激起人民的响应,相反大部分群众都会“谨慎地”对待此类事件。苏联领导人已觉察到危机的信号,意识到民众在情绪上的微妙变化。为了稳定政局和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认为最理性的做法便是不再进行新的镇压,并通过以前遭镇压人口的大赦、解放和平反等活动来尽

^① 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战争期间实施的民族驱逐虽有国防方面的考虑,但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民族问题,强制实行民族同化和融合。当时虽然各边远少数民族中存在叛国情形,但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红军的。如果仅仅由于少数人叛国,便对整个民族实施惩罚的话,那么,俄罗斯族人中也有叛变者,是否也应将俄罗斯人整体迁移。如此结论当然非常荒谬。具体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47; Ворсбехер Г. Г. Немцы в СССР // Знамя, 1988, №10, с. 143.

可能地挽回民心。

1954~1960年,苏联特殊移民制度难以为继还因为它面临一系列深刻的危机。首先,从1953年起国家基本停止了针对国民的强制性驱逐活动,特殊移民的源头枯竭了。其次,在政治“解冻”的社会环境下继续对几百万合法居民实施警察式的管理方式已显得不合时宜。最后,特殊移民政策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进步发生了严重的抵触。另外,当局解放特殊移民还有一个原因。苏联部长会议自认为,特殊移民已在当地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即使得到了迁居自由,这些人也不会离开移民区,不会破坏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殖民成果”。^①

特殊移民的解放

1953~1965年,苏联特殊移民的解放活动共经历了以下四个主要阶段:①1953~1954年中,特殊移民解放政策的前期酝酿。②1954年中至1956年末,绝大多数特殊移民已被解除人身限制,但仍无权返回原迁居地,特殊移民实际转变为行政移民。③1957~1958年,当局对前一阶段的特殊移民解放政策作了一些修正,允许部分被驱逐少数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和巴尔卡尔等民族)重返故乡并恢复其在被驱逐前所拥有的民族自治地位;对剩余多个类型特殊移民实施了解放。④1959~1960年,以最新颁布的刑事基本法为依据当局对当年一些没有具体过失,只是由于与“反苏分子”存在亲属关系和社会出身等原因便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人给予解放;1961~1965年,对特殊移民区内犯有“各种具体罪行”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和匪帮领导人等逐步予以解放。

事实上,截止到1953年初有些特殊移民类型(例如1940~1941年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波兰族阿萨特尼克—难民和1937年被从远东地区迁往中亚的朝鲜族人)已经不复存在,还有一些特殊移民类型(如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当时登记在册的人数只有24686人)在人数上已大量减少。因此这时苏联政府准备解放的主要是40年代以后被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233.

(1)“特赦令”的颁布和解放特殊移民的前期准备(1953~1954年)。

1953年初,苏联特殊移民共计2753356人(其中成年人口1862222人)。^①1953年,当局已不再大量向特殊移民区发送新移民,但也未出现特殊移民被大规模解放的情况,只有少量特殊移民被解除人身限制。^②

当局实施宽容政策的第一项举措便是颁布了大规模特赦囚犯的文件。根据贝利亚的提议,1953年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实行大赦》的法令。大赦法令几乎未涉及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依据该法令当局提前从古拉格集中营和劳改营释放了1201738名囚犯(比重占截至1953年4月1日古拉格在押囚犯总量的53.8%)。^③

1953年4~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贝利亚和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原计划在1953年底以前解放170万特殊移民。但是,由于贝利亚的被捕,该计划并未实施。苏共中央认为贝利亚在1953年秋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计划是有害的,因为这将导致大范围的人口迁移和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既定目标的实现。苏共中央决定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应在以后数年内循序渐进地加以解决。

1953年下半年,当局只是放松了对各特殊移民区的监管力度。苏联内务部1953年11月18日指令规定,内务部各地方机关有权不加限制地向因公务和私人事务需要在移民区范围内迁移的特殊移民发放许可证。^④苏共中央主席团责成由苏联总检察官Л. А. 鲁坚科、内务部长С. Н. 克鲁格洛夫、苏联国家安全部长И. А. 谢罗夫和司法部长К. П. 格尔申宁等组成的委员会首先对解放特殊移民的相关问题进行审议,并将审议结果向苏共中央作出汇报。鉴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如此决定,苏联内务部于1954年5月又制订了一个解放特殊移民的新计划,并提交给该委员会审核。经商议,委员会认为近期内可以解除人身限制的特殊移民人口具体如下:不满16周岁的特殊移民子女,16周岁以上且在学校读书的特殊移民子女,1929~1933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10-211-212 (附表43)。

② 1953年被当局注销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共计88363人。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25。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28。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30。

年遭到强制迁移的流放富农,德意志族动员民和当地民。

(2)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1954~1957年)。

从1954年中起,当局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①开始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1954年,被解除人身限制的特殊移民有:1929~1933年遭到强制迁移的流放富农,1936年遭到迁移的波兰人,1937年来自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移民,德意志族特殊移民中的当地民、动员民和遣返民,1942~1944年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罗斯托夫和克里木诸州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的帮凶”,卡巴尔达人,“正宗东正教徒”,以及未年满16周岁子女和年满16周岁仍在学校就读的上述特殊移民子女。在解放了上述人口之后,特殊移民的总体数量几乎下降了1/3。特殊移民各类型人口数量也有了大幅缩减,仅德意志族特殊移民中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数便有将近40万人。^②从1955年1月1日起,苏联内务部特别4处的登记册上再未提及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类型。

1955年,当局继续颁布一系列特殊移民解放法令。^③根据这些法令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有:特殊移民中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和苏联奖章及勋章获得者,因与特殊移民——当地民或克里木鞑靼、车臣等诸被驱逐少数民族男性拥有夫妻关系而被一同迁移,尔后又终止了此类婚姻关系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民族妇女,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单身残疾人和不治病症患者,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家属,高校教师,“符拉索夫分

① 1954年3月27日苏联内务部和苏联检察院《关于逐户解放特殊移民子女》的法令;1954年5月14日苏联内务部《关于注销在连续农业集体化期间遭到迁移的德意志族流放富农人口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44/4-19636号指令;苏联部长会议1954年7月5日《关于撤销特殊移民法律地位方面的一些限制》的决议;1954年8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的前富农及其他人口的限制》的第1738-789cc号决议;1954年8月20日苏联内务部第00713号法令。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35。

③ 1955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解放特殊移民区内苏共党员、预备党员及其家属》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1955年11月24日颁布的《关于解放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的决议;1955年9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对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与占领军当局合作的苏联公民实施大赦》的法令;1955年11月24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1949年从格鲁吉亚共和国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希腊族苏联公民予以解放》的指令。

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卡巴尔达人，1949 年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21269 人），1949 年来自格鲁吉亚的希腊族移民。由于上述法令的实施，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数已约占同期特殊移民人口总量的 2/3。^①“符拉索夫分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和卡巴尔达人等四个特殊移民类型也基本被消灭。此时，仍滞留在移民区的特殊移民主要与其民族特征有关，如“符拉索夫分子”中未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德意志、克里木鞑靼、车臣、印古什和卡拉恰耶夫等族人。

1955 年末，当局开始解放诸被强制迁移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1955 年 12 月 1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撤销对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德意志族特殊移民中的普通移民和遣返民均被解除了特殊移民身份，但这些人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之后均无权返回原迁出地区和向国家索要自己在迁移过程中被剥夺的财产。^②

1956 年，根据当局相关法令^③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包括：1946 年至 1955 年以“符拉索夫分子”身份被强制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军官、高校教师、卫国战争的参加者、苏联奖章和勋章获得者等家属、已被解除限制的特殊移民家属、被驱逐少数民族中的车臣族、印古什族和卡拉恰耶夫族等特殊移民。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36.

②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53.

③ 1956 年 6 月 29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清除在对待前战俘及其家属问题上粗暴违反法律的影响》的决议；1956 年 1 月 17 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 1936 年从乌克兰共和国苏波边境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波兰族人实施解放》的决议；1956 年 3 月 12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解放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的补充规定》的决议；1956 年 5 月 15 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解除已从流放区获释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族人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决议；1956 年 3 月 1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卡尔梅克族人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1956 年 3 月 27 日颁布《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希腊、保加利亚、亚美尼亚等族人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1956 年 4 月 28 日颁布《关于解放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内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等族——苏联公民，库尔德、赫姆等族人及其家属》，1956 年 7 月 16 日颁布《关于解放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等族人及其家属》，1956 年 9 月 22 日颁布《关于对特殊移民区内一些外国侨民、已取得苏联国籍的无国籍者和前外国国民实施解放》等法令。

(3) 修正以前所颁布的相关法令和继续解放特殊移民（1957～1958 年）。

1957 年，当局对上一年所颁布的特殊移民解放法令作了一些修正，允许一部分少数民族——特殊移民返乡和恢复以前被取缔的民族自治区。关于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各联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审判机关、检察院和内务部机关等均颁布了相关法令。例如 1957 年 1 月 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组建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州》，《关于将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改建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关于将切尔克斯自治州改建为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和《关于重建俄罗斯联邦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等法令。这些新颁布的法令承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56 年 3 月 17 日、4 月 28 日和 7 月 16 日所颁布诸法令中的部分内容（即禁止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卡尔梅克、巴尔卡尔、卡拉恰耶夫、车臣、印古什等族人及其家属返回原迁居地等）已丧失原有法律效力。^①

1958 年，由于当局所颁布的相关法令^②而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包括：“奥乌诺夫分子”，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地区的特殊移民^③，“达什纳克党人”，“巴斯马奇分子”，“安捷尔斯分子”，特殊移民区内的苏维埃代表，工会和共青团机关人员，受家属赡养者，在被迁移时年龄不满 16 周岁的特殊移民子女，等等。

1958 年，当局所颁布的解放法令和其他相关决议的实施结果如下：战争前来自西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右岸等地区的特殊移民人口数量剧减；战后由被驱逐的“奥乌诺夫分子”、立陶宛人、拉脱维亚

①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54–255.

② 1958 年 1 月 13 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对特殊移民区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和战俘等实施解放》的决议；1958 年 3 月 28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对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给予解放》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58 年 5 月 19 日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58 年 8 月 2 日法令。

③ 战后遭到当局驱逐的“奥乌诺夫分子”、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等特殊移民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匪帮和民族主义者”、“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匪帮帮凶”，“匪帮帮凶家属”和“富农—民族主义者及其家属”。其中“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特殊移民也分为五种类型：镇压过程中被打死匪帮家属，逃避集中营关押、劳动教养、监狱诸惩罚者或被判处极刑者家属，从集中营、劳动教养所、监狱等获释后迁入特殊移民区人员家属，拥有非法身份者家属，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中居住地不明者。

人和爱沙尼亚人等构成的5个特殊移民亚类型也缩减至两个,即“匪帮和民族主义者”和“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截止到1958年6月“达什纳克党人”仅剩42人;“巴斯马奇分子”,“安捷尔斯分子”和“达什纳克党人”等类型特殊移民已全部被解除人身限制。^①

(4) 特殊移民解放问题的基本解决(1959~1965年)。

由于一系列解放法令的颁布,苏联特殊移民人口总体数量急剧减少。截至1956年1月1日,在册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为904439人,截至1956年7月1日为611912人,1957年1月1日为211408人,1957年7月1日为178363人,1958年1月1日为147741人,1959年初只有近5万人。^②

在对特殊移民实施大规模解放的同时,当局还对监督他们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进行了大幅削减。特殊移民区行政管理人员数量呈逐年下降的态势(截至每年1月1日):1952年15778人,1953年10753人,1954年8838人,1955年5282人,1956年3778人,1957年780人,1958年只剩下705人。^③1958年2月3日,苏联内务部特别四处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近4年来(1954~1957年),根据党和政府颁布的相关决议特殊移民人口下降了94%,而同期对特殊移民实施监督的内务部工作人员数量也缩减了95.5%。”^④

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活动发生在1960年初,其依据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1960年1月7日法令。1960年1月7日解放特殊移民法令的实施使战后从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右岸等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各特殊移民类型仅剩:“匪帮和民族主义者”,耶和華教徒、少量“正宗东正教徒”和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遭到迁移的特殊移民。

1960年代上半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接连颁布了3个法令:《关于解放特殊移民区中18周岁以下因所犯罪行而被判刑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和民族主义武装匪帮前成员》(1961年4月18日),《关于对一些类型特殊移民实施解放》(1963年12月6日),《关于解放“耶和華见证会”、“正宗东正教会”、“英诺肯提乙派”(1908年出现在俄国的东正教派别)

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成员—特殊移民及其家属》(1965年9月30日)等。至1965年,在册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到1万人。苏联特殊移民的解除人身限制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特殊移民的遗留问题

苏联当局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活动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实施的,而赫氏本人当年也是特殊移民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以他为首的苏联政府所进行的特殊移民解放活动必然存在一定的不彻底性,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与特殊移民有关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一,当局没有对20世纪30~40年代斯大林的强制移民活动作出公正的评判,没有从政治上对特殊移民给予彻底平反。在自己所颁布的解放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的法令中当局总是极力回避对以前所实施的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行为作出正面评价。政府相关法令根本没有提及为诸遭驱逐民族进行政治平反的问题,只是强调强制迁移“与战争状态有关”,而如今之所以解放这些人似乎只是由于继续将其限制在特殊移民区内“已没有太大必要了”。根据这一逻辑来推理,这些遭到驱逐的民族仍是有罪的,政府以前所作的所有强制驱逐活动都是有其“必要性的”。

第二,当局没有对特殊移民在强制迁居期间被剥夺的财产予以应有的经济补偿。当局在所有颁布的法令中均指出,在解放这些特殊移民的同时政府不承担返还这些人在迁移时被充公的财物的义务。例如1956年4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关于解除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等族—苏联公民,库尔德、赫姆等族人及其家属的限制》的法令中便规定:“鉴于对1943~1944年被从北高加索、格鲁吉亚共和国和克里木等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等族人继续在法律地位方面实施限制已无必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1)对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内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和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等族人给予解放,并撤销苏联内务部机关对他们所实施的行政监督。2)规定:对符合本法令第一款的特殊移民给予解放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承担返还其迁移期间被充公财物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当局还要求所有被解放的特殊移民均必须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画押,声明自己将不希望政府返还自

①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72.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74.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75.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78.

已在迁移时被充公的财物。^①

第三,当局在解放了近乎所有特殊移民和允许部分被驱逐少数民族(如车臣族、印古什族和巴尔卡尔族等)返乡并重建原民族自治区的同时,拒绝给予其他一些被驱逐苏联少数民族(如德意志人、克里木鞑靼人等)上述同等权利。德意志和克里木鞑靼人被驱逐民族的返乡和自治区重建问题久拖不决,迫使这些民族在此后的40年间一直在为恢复本民族的应有权利而抗争。^②

第四,当局以搞政治运动的行政命令方式,简单化地处理特殊移民的返乡问题。以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被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为例。1956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卡尔梅克、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自治区》的决议。1957年2月21日,俄联邦部长会议也通过《关于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重建提供帮助》的决议。上述决议规定:在1957年内应让1.7万个车臣—印古什族家庭迁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可是苏共中央和俄联邦关于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和帮助车臣人、印古什人返回家园的决议没有在相关的苏共州委中进行研究和作出安排,甚至也没有在相关的区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和进行具体安排。例如车臣—印古什原州委班子和第一书记雅可夫列夫便对即将返回的大批人的居住、工作以及其他紧迫的安顿问题毫无计划和安排。恢复后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共有14个区,可所有区的区委书记对车臣、印古什人的返乡情况均一无所知,持袖手旁观的态度。^③

1957年初,大批的车臣人、印古什人潮水般地涌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他们大多拒绝接受政府部门为他们安排的新居住区,坚持回到原来被强迫迁出的旧住所,从而与当地现有居民发生严重冲突,导致人心惶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54.

② 参见 Айспальд А. (ФРГ) Российские немцы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х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3, с. 135; Волобуев О. В.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К КПСС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50-х — середина 80-х гг. XX в.)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6, с. 121; Бугай Н. Ф. 40—50-е год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архивы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91, №1, с. 87; 1992, №1, с. 35等相关内容。

③ 《1957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状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7页。

惶,大批俄罗斯人、达尔金人、阿瓦尔人和奥塞梯人纷纷逃离。斯大林集体农庄出逃的庄员有一百多户。莫洛托夫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几天之内就拆毁住房和农庄建筑物,然后出逃。到1957年5月,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已有1298户庄员出逃,其中971户是俄罗斯人。^①

面对这一情形,当地的区委,甚至州委领导,则拒绝接受将他们的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更拒绝接受或安排返回的车臣人、印古什人。1957年1月14日,舒拉加特区列宁集体农庄召开庄员大会,州委书记马卡罗夫和切尔克维奇也出席了大会。965人参加的庄员大会通过决议,集体请愿,拒绝接纳返回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决议说:“庄员全体大会请求苏共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委员会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向联盟政府提出在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编制中保留我们区的问题。全区集体农庄和全体集体农庄庄员都深信:我们无法与车臣人共同生活和工作。”^②苏共舒拉加特区区委第一书记阿布杜拉耶夫也明确表示:无法为迁回的车臣人安排工作。类似的事情在安达拉尔区、里特良布区、维杰诺区以及其他区都不断发生。苏共中央只是简单地给予阿布杜拉耶夫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便草草了事。

自1957年春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其他被强迫迁徙的人口返回家园开始,群殴、集体械斗、集体逃离等事件层出不穷。直至70年代初,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几乎没有间断过不同规模的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1973年1月,格罗兹尼发生大规模车臣人聚众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为此上报苏共中央,请求向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增派特种警察部队,重新部署苏联军队和加强暴力措施。1973年3月13日,苏共中央授权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以及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增强国家安全机构,加强现有技术装备,以确保社会治安。^③

① 《1957年6月4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② 《1957年5月15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③ 参见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苏共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进行的这场让被迫迁移民族回归家园的运动,不仅无助于消除昔日强制移民所造成的民族感情创伤,反而犹如在已渐结疤的创口上搓一把盐;更严重的是,这场回归运动不仅使当年被迫迁移的民族再受伤痛,同时也伤害了当年从其他地区迁到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要知道,当年也不是他们自愿迁来这里的;他们也是被行政命令动员来的,或者被“按计划分配来的”。他们在新居住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了十几年后,却遭遇了苏共中央人为的一场劫难。

第五,在解除对特殊移民人身限制的过程中新的苏联国家领导人不但没有吸取特殊移民活动的历史教训和彻底清算斯大林错误民族政策的遗毒,而且沿习斯大林的民族高压政策的旧辙,继续在执政期间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它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争取生态安全、经济自主权和民族文化复兴。这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其二,争取民族聚合,要求改变自治实体地位。这特别反映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的民族纠纷。其三,历史上曾受到迫害的民族要求平反,要求重返家园的活动。如克里木鞑靼人的抗议活动等。其四,争取共和国主权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在经济、社会文化相对较发达的一些共和国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主要是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其五,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国内民族自治单位要求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活动。如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两个自治共和国,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地区,俄罗斯的鞑靼斯坦、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要求扩大当地民族自决权、直至脱离所属加盟共和国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民族问题都在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民族分离主义对苏联的威胁最大。

平心而论,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国家政治大环境的改善,在思想禁锢有所缓解的情况下,苏联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发生反弹和各少数民族提出扩大民族自主权等要求本也无可厚非。作为国家新领导人的赫鲁晓夫本

应吸取斯大林的错误教训,运用民主、法制和政治方式合理解决民族矛盾。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承袭过去的传统做法,继续采取压制和动武方法来处理发生的民族冲突。例如当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和阻力而赫鲁晓夫决定把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部分权力收归联盟中央时,1959年8月以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克拉夫为首的一批领导干部便抵制联盟中央的决定,主张共和国自主发展和管理经济。赫鲁晓夫对此正当要求大为恼火,下令对拉脱维亚共和国中央和首都里加市的党政机关进行清洗,以强制手段打击民族自主的要求。在不到半年时间,当地就有24名主要领导被解除了职务。1961年12月,格鲁吉亚哥里市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拆除斯大林铜像。这是斯大林的故乡人对他怀念的表现,赫鲁晓夫本应采取疏导办法处理这一事件。可他却下令出动军警进行镇压。1961~1964年,乌克兰出现了以知识分子、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高等学校师生为核心的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地下组织“乌克兰工农联盟小组”和“乌克兰民族委员会”。其主张维护乌克兰共和国独立自主权,反对联盟中央集权制。根据苏联当局的旨意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卢克雅连科、康巴吉、魏伦、利鲍维奇等人均被捕入狱,受到审判和被判以重刑。苏联当局甚至于把基辅大学师生要求保护乌克兰语言文化传统,青年师生和市民举行纪念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科的活动也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加以取缔,对其组织者绳之以法。同期,其他共和国也出现过要求维护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传统的活动,但都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打击或镇压。^①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也继续采取民族高压政策。例如1965~1967年在乌克兰出现了主张扩大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乌克兰民族阵线”等地下组织。基辅市高等学校师生和市民多次集会要求保护和发展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撰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批评苏共的民族政策。苏联当局把这些事件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并逮捕和关押了数百名组织者和参加者。伊凡·久巴被开除党籍,判处重刑。1968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奇尔奇克市的克里木鞑靼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返回家园和恢

^①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53~154页。

复民族自治实体。但在当局的镇压下最终有 300 多人被捕入狱。1972 年 3 月, 苏共中央通过了批判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市党组织的工作的决议, 指责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等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结果, 200 多名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和主张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党政干部被撤职查办, 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1972 年 5 月, 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因撰写了歌颂和维护乌克兰历史文化传统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被当局免职, 受此株连的共和国中央和州、市、区委干部还有 50 多人。1974 年 5 月, 苏联当局审判了“亚美尼亚统一党”成员托夫马相等 20 多人, 同年 12 月逮捕了“爱沙尼亚民族阵线”成员缅尼克等十儿人。1975 年 4 月, 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党委书记阿鲁久尼扬因“庇护民族主义”被批判和解职, 其他多名州委干部均受到牵连。同年 11 月, 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舰上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族士兵因反对民族歧视而遭到当局镇压。1976 年, 贾巴里泽因在格鲁吉亚作协八大上批评强制推广俄语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出作协。^①

总之,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国家领导人在解放特殊移民和以后执政过程中仍将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 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 继续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和在民族关系中播下不和的种子。由此导致苏联内部的民族离心倾向不断发展, 民族问题最终演化为点燃苏联剧变的导火索之一。

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

特殊移民政策涉及农民和民族两个方面的问题, 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国家的最终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负有一定的责任。

第一, 特殊移民促成了生产关系超前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实现, 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 消灭了俄国农民中最积极肯干, 最有经营头脑的中坚力量, 助长了农村中的闲散、懒惰等不良风气; 损害了工农联盟, 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构成威胁。

^①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 第 156 页。

20 世纪 30 年代初, 苏联当局实施强制移民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通过政治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剥夺, 一方面取得建立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手段, 另一方面又可铲除反对派, 威慑农民中的等待观望者迅速加入集体农庄。

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维埃政府开始了集体经济的实践。军事共产主义时期, 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已出现了集体农庄、共耕社和农业公社等集体经济形式。但由于这种体制效益低下, 对农民没有吸引力, 一直没有形成规模。20 年代, 合作社的发展依然缓慢, 国家的重点主要放在建立供销社方面。甚至到了 1928 年年中, 集体农庄农民还不到苏联农户总量的 2%, 其播种面积也没有超过全国总面积的 2.5% 和谷物播种总面积的 2.1%。^① 截至 1929 年 11 月, 全国只有 6 万多个集体经济组织, 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3.6%, 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中农户只有全国中农户的 3.3%。^②

1930 年 1 月, 党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出决议, 规定苏联必须在 1932 年基本完成全盘集体化。全盘集体化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抵制。斯大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分子反抗改造的表现, 要求采取强制措施, 以阶级观点对待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 年 1 月 16 日, A. A. 安德烈耶夫从北高加索边疆区向斯大林发电: “我们正准备将富农迁出边疆区境外, 需要中央对以下各项举措予以批示: 1) 将极其反动分子约 2 万人迁往北部殖民区。1/4 的富农分子被迁出边疆区, 一定会对留下来的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2) 希望尽量加快富农迁移进度。”安德烈耶夫建议中央“最好能根据地方的愿望, 将这一针对富农的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有必要“全部没收富农用于剥削式经营的生产手段和工具, 以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壮大”。^③ 从安德烈耶夫的上述电报内容可明显看出, 北高加索边疆区区委正试图将针对富农的强制迁移活动合法化。不久, 当局便出台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其中规定: 凡不愿立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 即使是中农或是贫农也将视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准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分子”予以镇压——剥夺选举权, 没收财产, 流放外地。在如此强大的政治

^① 罗·麦德维捷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第 102 页。

^②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 第 103 页。

^③ Фанасьева Н. 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6, с. 284.

攻势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起来。截至1930年3月1日,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稍后,由于农民反应强烈,斯大林发表了《被胜利冲晕了头脑》的文章,当局放松了对农民的强制,很多刚刚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都纷纷退出。但随着政府镇压政策的再度加强,农户集体化的比重又开始迅速增长。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1490万农户被组织进21万个集体农庄。集体化农户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的6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有360万农户加入农庄。苏联农村集体化比例达到了93%。^①就这样,苏联完成了改造小农的任务。

事实上,截至20年代末全盘集体化前夕沙皇俄国时期原本意义上的富农阶级已在1918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基本消灭殆尽。后来,苏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富农力量又有所恢复。但他们大多是农村中拥有较高劳动技能、文化知识、善于经营和销售的中农,未必可以列入富农的队伍。镇压富农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农民中那些积极勤劳肯干的中坚力量基本被消灭。随着经营自主权的丧失,依赖心理和闲散习气在苏联农村中占据了上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生产效益低下。

在强制移民的威胁下数千万中农违心地加入了集体农庄,被迫交出家具、牲畜以及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失去了独立劳动者的地位,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大量农民在被迁移和加入集体农庄之前通常会把牲畜和家禽都宰杀掉。仅在1930年2~3月间,便有1400万头牛、占总数1/3的猪和1/4的绵羊与山羊被农民故意宰杀。^②1930年到1933年,哈萨克地区的大牲畜减少了4/5,牛从650万头减少到96.5万头,羊从1860万只减少至130万只,马从350万匹减少到30万匹,骆驼从100万头减少到60万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畜牧业规模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③农民中普遍存在消极怠工、有意损坏劳动工具和忍痛挥霍多年积蓄的现象。例如某地区有家酒店在1930年2月的一个月

内便卖了4万卢布左右的酒,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20台拖拉机。另据报道,在不少集体农庄中收获时损失的粮食达到全部粮食的20%~40%。^①全盘集体化后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谷物产量一直低迷不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年均谷物产量为736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②

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再强调工农联盟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最后几篇口授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工人分裂”。^③

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工农联盟原则。它以拔苗助长的方式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通过使用强制和镇压等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服从国家利益,打击和消灭农民中的中坚力量,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导致广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农业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日益陷入危机之中。

第二,特殊移民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隔阂;恶化了边远移民区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族际关系;强行变更民族居住地,人为地加剧了国家内部原有的民族矛盾。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持把解决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问题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同促进各民族全面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处理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基本原则的论断,并把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背离了列宁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他无视民族平等和自决等原则,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一律归结为阶级矛盾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社

①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05页。

②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2页。

③ 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①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87页。

② 李仁峰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1,第19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77页。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是导致阶级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前进越顺利,那么注定灭亡和绝望的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加激烈。^①正是基于上述错误认识,斯大林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境内诸少数民族的特殊移民活动。30年代初镇压富农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便大量遭到流放。30年代中期以后,芬兰、伊朗、库尔德、朝鲜和波兰等多个民族被强制迁移。时至40年代,当局又对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民族实施了整体迁移。

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大量利用特殊移民劳动力的过程中苏联政府往往采取粗放式经营的方式,对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发。这使许多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巨大破坏,从而严重影响了族际关系。如在发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农业水利和工业生产过程中当局对咸海的主要供水源——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河水开发和利用过度,致使这个世界上第四大湖的储水量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在哈萨克斯坦由于当局盲目发展采矿和冶金工业,大量重金属、硝酸盐和致癌物质流入河流、湖泊和水库,造成水源和大气层的严重污染。根据苏联中央指令性计划,从30年代起政府就在乌兹别克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棉花生产。由于科学管理水平低,滥用化肥,致使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这些问题引起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外,波罗的海地区农业集约化水平比较高,但化肥施用量过大,河流和其他水源也受到污染。特别是当局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大规模地开发磷灰岩,发展化肥工业,每年从化肥厂和发电厂排出数十万吨有害物质,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导致略尔努斯海湾的污染超过了国际规定标准几十倍。为此,当地居民曾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强烈抗议。在特殊移民劳动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上述生态污染问题是影响苏联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②

早在1917年之前,俄国便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它是沙皇在300多年间依靠侵略扩张、制造民族纠纷、挑动民族仇视、实行分而治之和残酷屠杀等手段形成的,民族积怨甚深。特殊移民期间,

苏联当局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迁移诸少数民族和变更其历史居住地的错误做法更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积怨和加剧了民族仇恨和矛盾。苏联解体后爆发的车臣战争便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

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错误做法不仅无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关系的改善,相反只会加剧已有的民族矛盾和产生新的民族问题。而日积月累的民族问题和潜伏的民族危机一旦遇到适当的条件和时机,又必然要爆发出来,造成难以收拾的严重后果。

第三,特殊移民活动导致大量农业人口外迁和死亡,给国家人口再生产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为俄国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口状况不容乐观。2000年B. B. 普京总统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所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近十年来俄国人口每年减少75万,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导致在15年之后我国人口下降3300万的严重后果。”^①俄国在21世纪所出现的人口危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历史来看,俄国一直都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战争频仍等原因,俄国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非常缓慢。进入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天灾、人为制造的变故、苏联的解体和国家经济的衰败等都是导致俄国人口危机的重大原因。苏联领导人在30~50年代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加剧了俄国人口危机的趋势。

强制移民和全盘集体化导致苏联农村生存环境恶化、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民的分化,引发农业人口大量逃亡和迁移。这些从农村地区流失的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留在当地的大部分都是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据苏联学者普利马克指出,在集体化运动中因受当局迫害和迁往城镇等因素影响,苏联农村共减少了300万农户(1500万人)。^②由于向城市迁移和死亡,农业人口在1929~1940年从5370万下降至3410万,损失了约1/3。^③

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全盘集体化对斯大林执政时期数次农业危机中的大量人口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集体农庄社员的利益被

^① Вербичкая О. 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 - 1959гг, Проблема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развития, М.: ИРИ РАН, 2002, с.3.

^②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272页。

^③ 李英男主编《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道路》,外文出版社,2004,第18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19~320页。

^②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72页。

漠视、社员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抗灾能力降低和农业凋敝的情况下,1932~1933年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广大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人口损失巨大。针对这一天灾人祸,当局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要求农民完成国家农产品采购任务。各地农庄和社员被迫将种子粮和口粮全部交出,结果导致众多农民陷入饥寒交迫之中。1940年9月,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承认,30年代初期国内共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①据西方估计,1932~1933年大饥荒中有300万~400万农民饿死。^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拖拉机站政治部在相关报告中说,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在这次饥荒中共有230万居民饿死,90万哈萨克人迁往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家。^③乌克兰共和国居民减少300万。^④另据康克威斯特认为,1930~1937年的7年中苏联共有1450万农民死亡。^⑤

整个特殊移民活动中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600万。特殊移民在迁往国家指定居留地的过程中死亡、患病现象极其普遍。1933年5月,М. Д. 贝尔曼在写给Г. Г. 雅戈达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您曾多次批示北高加索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要求对发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集中营和劳动移民区的专列做好组织工作,并配备整套服务设施,但移民专列的状况依然相当糟糕。所有源自北高加索的移民专列中均存在人口大量死亡和患病的现象……”又据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负责人报告,从北高加索发往新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10185人中死亡共计341人,比重达到3.3%。另外,还有大量特殊移民患有营养不良等疾病。^⑥

特殊移民区大多处于荒僻边远地区,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恶劣,再加

上当地移民管理部门目无法纪,恶意虐待,迁移初期特殊移民人口均呈现负增长态势。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为例。1930年代上半期,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尤其是新生儿的死亡率更高。1932年,摩尔曼斯克自治区的西比诺格尔斯克(基洛夫斯克)区特殊移民新生人口为420人,死亡864人,其中儿童死亡人数达到589人,在该地特殊移民死亡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68.2%。^①1931年10月26日,亚戈达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鲁祖塔克的报告中指出:“特殊移民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北哈萨克斯坦移民月死亡率达到1.3%,纳雷姆斯克边疆区达到0.8%。其中尤其是婴幼儿存在大量死亡的现象,如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地区,婴幼儿的死亡率占到了当地人口月死亡总量的15%。导致儿童大量死亡的原因除传染病、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周之外,主要还由于缺乏必要的儿童营养食物。”^②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1950年特殊移民死亡人口至少有120万。^③

截至1950年代末,农村人口仍在苏联人口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特殊移民活动所引起的农业人口大量死亡,成千上万精壮人口的流失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农村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④它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性别失衡状态、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质量的下降趋势,对苏联人力资源再生产潜力构成威胁,为俄国未来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第四,特殊移民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肆意践踏国家法制,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给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1989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相关宣言中承认,“政府从前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强制迁移法令属于非法和犯罪性质……”它指出,“斯大林时代那些痛苦的记忆至今仍在我们心头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迹。违法和恣意妄为成为普遍现象,大规模的逮捕,集中营折磨,无数妇女、儿童和老人无家可归。所有这些惨景至今仍折磨着我们的良心,成为我们永远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苏联最高苏维埃认为,强制移民活动是最严重的犯罪并无条件地对之予以强烈谴责。它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背离了社会主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39.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39.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81-282.

④ Вербицкая О. 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 гг., с. 205.

① 《苏联农村新事》1987年第12期,第6页,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② 1988年9月16日《真理报》,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③ 《东欧中亚问题译丛》1992年第6期,第122页,转引自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④ 《乌克兰共产党人》1989年第11期,第47页,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⑤ 康克威斯特:《悲哀的收获:苏联集体化运动和令人恐怖的饥荒》,伦敦,1986,第306页,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⑥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29.

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苏联最高苏维埃保证此类践踏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件再不会在我们国家重演。”^① 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宣言充分证明了苏联特殊移民活动的非法性质。

在特殊移民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丑恶现象。近年来，俄国学者公布了许多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原苏共北奥塞梯州委部门负责人印古什族人 X. 阿拉比耶夫回忆了自己当年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情景：“那是 1944 年 2 月里的一天。在超载的‘装牲畜用的’车厢内见不到一丝光亮，也没有一滴饮水。几乎一个月时间，我们都是在此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行……有的人得了伤寒，却得不到任何医治……只能在人迹罕至的会车处，在列车暂时停靠的那几分钟内用蒸汽机车的煤灰将死人草草掩埋在附近，如果有人企图离开火车 5 米之外，便会被随行的警卫人员枪杀。”^②

关于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的生活状况，1933 年 7 月 3 日古拉格负责人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工农监察局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物资供应标准的下降，在林业部门（尤其是乌拉尔州和北部边疆区）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生存状况也急剧恶化了……北部边疆区和乌拉尔州林业部门的特殊移民中普遍存在以粮食代用品充饥的情形，甚至有人吃猫、狗和死亡牲畜的尸体……由于饥饿，特殊移民的患病和死亡人数剧增……有人因饥饿而自杀。由于营养不良特殊移民根本无法完成劳动定额，一些人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特殊移民在生产过程中或在下工返回的途中便因饥饿而死亡……”^③

特殊移民除了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物资供应和生活资料匮乏外，精神上还要忍受行政警备人员和小头目们的欺压和污辱。后者可随意提高移民的劳动定额或压低其工作量评估，克扣其口粮，取消孕妇的物资供给，将丧失劳动能力者指责为装病并指使爪牙对其任意实施殴打。乌拉尔州执委主席 1931 年 5 月 9 日在一份《关于特殊移民的迁移、经济安置

和劳动利用》的文件中指出：地方上出现了大量针对特殊移民的“犯罪和污辱事件”。在很多移民区均存在这样的事实，“移民区管理部门……不给特殊移民发工资（如楚索夫斯克林业局），给移民制定根本无法完成的劳动定额，不给在工区工作的移民发放食物和必要的服装，拒绝向患病的特殊移民提供救助，强制驱赶快要临产的孕妇和儿童参加劳动，任意对移民实施打骂，等等”。^④ 一些企业领导者经常会公开表示对移民的恶感。例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应国家动员而参加劳动军的德意志族人经常会受到管理人员公开的歧视。1943 年 8 月索里卡姆斯克纸业联合企业工厂的德意志族人在食堂吃午饭时，有关部门刻意将其安排在最后用餐，而且不给他们吃第二道菜。第二工段的负责人巴尔科夫斯基有意将原先应给德意志族人的补餐券发给了其他工人和犯人，并宣称：“你们，德国佬！还加什么餐！”^⑤ 1948 年 12 月 2 日“莫洛托夫森林纸业”托拉斯姆基辛斯克林业局副局长在工人大会上便曾这样答复移民关于改善生产和物资供应状况的请求：“即使死上 10~15 个人（指移民），我们也无所谓。”^⑥

当局在特殊移民期间的残暴和不人道做法，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伤了广大民众的心。特殊移民大量的申诉信充分反映了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纳兹拉尼村特殊移民 C. III. 伊兹马伊洛夫便写道：“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要让他知道，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没有人性地对待整个民族的事件。”卡尔梅克族人 A. Y. 巴德马耶夫和苏塞耶夫说，“当局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旨在灭绝印古什、车臣、鞑靼、卡尔梅克诸民族的犯罪活动。斯大林所颁布的宪法是彻头彻尾的样子货”。“我真不明白，在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被如此摧残的情形下斯大林又怎么能说出关于苏联民族大团结的话来呢？！难道，在经过这一切之后还可能存在所谓的民族统一和巩固的国际主义吗？”^⑦

第五，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集体农庄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

① Сулов А. 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 - х - начала 50 - 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3, с. 130 - 131.

② Сулов А. 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 - х - начала 50 - 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с. 130.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170 - 171.

④ Бугай Н. Ф.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7, с. 42.

① 1989 年 11 月 25 日《消息报》，引自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183.

② Бугай Н. Ф. К вопросу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30 - 40 - х годах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9, №6, с. 140.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34 - 35.

极性,扼杀了农民的个性和主动精神,导致农业发展丧失了革新的活力,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改革举步维艰,国家陷入危机;特殊移民活动对苏联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国家领导人对农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但他们没有废除斯大林当年通过镇压农民手段才得以建立的集体农庄农业体制,没有改变庄员对国家的依附地位。因而成果是暂时的,危机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农业问题积重难返,陷于停滞。苏联农业生产的长期落后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苏联农业长期低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产量徘徊不前,市场供应紧张。1986~1990年苏联谷物年均产量为1.965亿吨,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略有提高,但低于1976~1980年的2.05亿吨。棉花、甜菜的情况也相类似。棉花年均产量是840万吨,低于70年代的855万吨。甜菜为8730万吨,也低于70年代的8870万吨。1991年的情况更糟,谷物产量直线下跌到1.6亿吨左右。^①农业的停滞倒退,再加上收购供应渠道的日趋瓦解,国家掌握的农畜产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断增多,对高脂肪高糖高蛋白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结果导致供求矛盾日趋尖锐,市场上每一卢布货币只有0.12~0.14卢布的商品。农业捉襟见肘,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安定局面无法维持,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锐意改革,但改革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改革年代,斯大林当年镇压富农、消灭个体农民阶级的特殊移民举措的恶果逐渐显现。这在苏联解体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长期在行政命令和农庄制度的保护下从事生产活动,苏联农民的个性遭到窒息,没有了劳动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多数农庄庄员已不会独立进行农业生产,习惯于一切依赖农庄和安于现状。相当一部分庄员甚至不知离开集体农庄后如何生活。他们害怕竞争,惧怕变革,特别是那些前景不明的变革。据1990年1月对823名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只有40%的人希望独立经营生产。当问及获得土地后想做什么的时候,44%的人回答要种蔬菜瓜果,26%的人

想建私房,很少有人想进行大田生产。至于农村干部,则大多数都反对或抵制发展私人经济。1990年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土地法》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们几乎一致反对平等对待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①农民个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成为苏联农业变革的巨大障碍。

改革的最大危险更来自民族问题。由于特殊移民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和苏联新国家领导人继续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等原因^②,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国家已是进退维谷,岌岌可危。按说,苏联有耕地2.15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达0.79公顷,比美国多5%,粮食本应自给有余,但如今却要每年花费大量外汇进口3000多万吨粮食。政府为弥补外贸赤字,每年不得不减少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大量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料。恰逢当时世界石油和黄金价格急剧下滑,苏联欠西方的外债高达800亿美元。经济陷入困境,政府被迫向外国进行粮食借贷,结果使国家的债务愈加沉重。苏联对国外金融资本不断增长的依赖,迫使她不得不经常向西方作出妥协,政治上沦为西方资本的人质,改革受到西方国家的钳制。随着冷战对峙的日趋缓和,公开性、民主化思潮的广泛传播,农民已很难再忍受斯大林体制,更不愿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主义威望不断下滑。人民对改革的兴趣直线下降,对政治家们的活动越来越冷漠。一些政治家为转移人民对生活状况及其政绩的不满,极力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1991年,苏联农业再度跌入低谷,城市供应明显紧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也被煽动到顶点。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终于导致国家的瓦解和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

在历数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广大特殊移民在国家边远地区经济开发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在促进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和对苏联东西部人口平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首先,数百万特殊移民的牺牲换来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如期建立和国

^①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2页。

^② 导致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的因素很多,除特殊移民政策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外,还包括联邦制变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大民族主义、历任苏联国家领导人在民族工作中的错误、经济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等(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三、四、五章相关内容,第76~229页)。

^①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3页。

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特殊移民政策促使农业集体化制度的迅速建立。虽然这种制度没有效率,但它的确将苏联粮食的商品率从1929年的13%增加到1933年的40%。1933年国家得到11.3亿普特商品粮,从而基本满足了国家对粮食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化。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果来看,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也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期间共有4500个新工业企业建成投产,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长了12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5倍,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①苏联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其次,特殊移民促进了俄国东西部的人口平衡。

在特殊移民运动过程中,当局将600多万人迁往国家东、北部边远地区。虽然,随着特殊移民的解放,大量移民返回了原迁出地,但最终还是有100多万此类人口留在了移民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东西部人口的不平衡状况。

再次,特殊移民政策促进了俄国边疆地区的土地和经济开发。

特殊移民在迁入移民区后便被大量利用于国民经济领域各部门参加劳动,并创造了相当大的业绩。这尤其体现在土地开发方面。例如截至1938年1月1日劳动移民共开发各类土地3035644公顷,其中,耕地和有耕种能力土地1128194公顷,刈草地287431公顷,牧场590789公顷,宅基地44914公顷,其他土地984316公顷(沼泽地2988公顷,可灌溉土地12857公顷,生荒地243161公顷,特殊移民通过挖掘树根,铲除和清理灌木丛而开发出的新土地183416公顷等)。其中俄罗斯联邦境内由特殊移民所开发的土地便有1662280公顷,其他联盟共和国——1373364公顷。截至1938年初由特殊移民铺设的土质道路共计7294公里,在农村地区架设桥梁21400米,开掘水井1578口。^②

不过从总体来看,苏联当局通过特殊移民政策而得到的这些“成绩”和“积极作用”的代价过于高昂,有些得不偿失。特殊移民政策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动员型发展模式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特点。它对国家的长远利

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特殊移民现象是苏联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是斯大林时期苏联产生的诸多悲剧性重大历史现象之一。它既与斯大林的名字紧密相关,同时也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活动的深刻烙印。特殊移民历史现象之所以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既是对俄罗斯帝国传统的沿承,同时也与斯大林对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和对马列主义关于暴力运用的经典论述的片面理解密切相关,另外还涉及斯大林防患于未然的心理、政治家“为求大善不避小恶”的善恶价值观及其暴戾的个性,等等。^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本身就是俄罗斯传统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流^②,因此这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历史现象必然会带有俄国历史和传统的印迹。国内落后的社会现状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个性粗暴、只对马列主义具有教条式理解的斯大林重蹈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发展模式的覆辙,而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斯大林模式又导致了特殊移民政策的出台及其实施。

探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诸问题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其中,最大的教训便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斯大林以简单粗暴的特殊移民方式来对待农民和处理民族矛盾,人为地加剧社会紧张和民族分离,最终导致农业问题和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重大诱因的前车之鉴无疑对当今的俄罗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善待农民、慎用暴力。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亡。苏联领导人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有善待农民,最终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和农业的破产,在人民的冷漠中葬送了整个国家。其次,谨慎对待民族问题。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问题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活动不但未能解决苏联旧有的民族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特殊移民的痛苦经历成为苏联少数民族心中一个永远的痛。苏联国家领导人没有谨慎地对待民族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他们试图以简单的人为“组织”或“融合”等强制手段来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①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39页。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53.

①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层原因》,《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第86页。

② 黄军甫:《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其当代意义》,《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第59页。

在经过动荡不安的9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在处理国内问题尤其是民族问题方面已变得成熟起来。有理由相信,普京之后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一定会吸取历史教训,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绝不会再犯苏联那样的错误——把步子迈得太急和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式,而会从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与发展、促进社会繁荣富强的高度,以更加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来重视和解决俄国当前所面临的农民和民族等敏感问题。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 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1943年5月,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组织形式而言,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党只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都独立了。虽然到中苏分裂之前,国际共运还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继续存在,但是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欧洲九国共产党的协调和指挥机构,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都是通过召开会议来统一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就斗争任务而言,共产国际在理论和逻辑上始终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己任,而在共产党情报局那里,所谓世界革命战略充其量只是莫斯科动员各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苏联的口号,苏共二十大则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①

^① 笔者对上述问题的论述详见《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一个大国的 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沈志华/主编

中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